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信使

2017年第2期（总第2期）

媒体：净化行动



ISSN 2096-4064



ISSN 2096-40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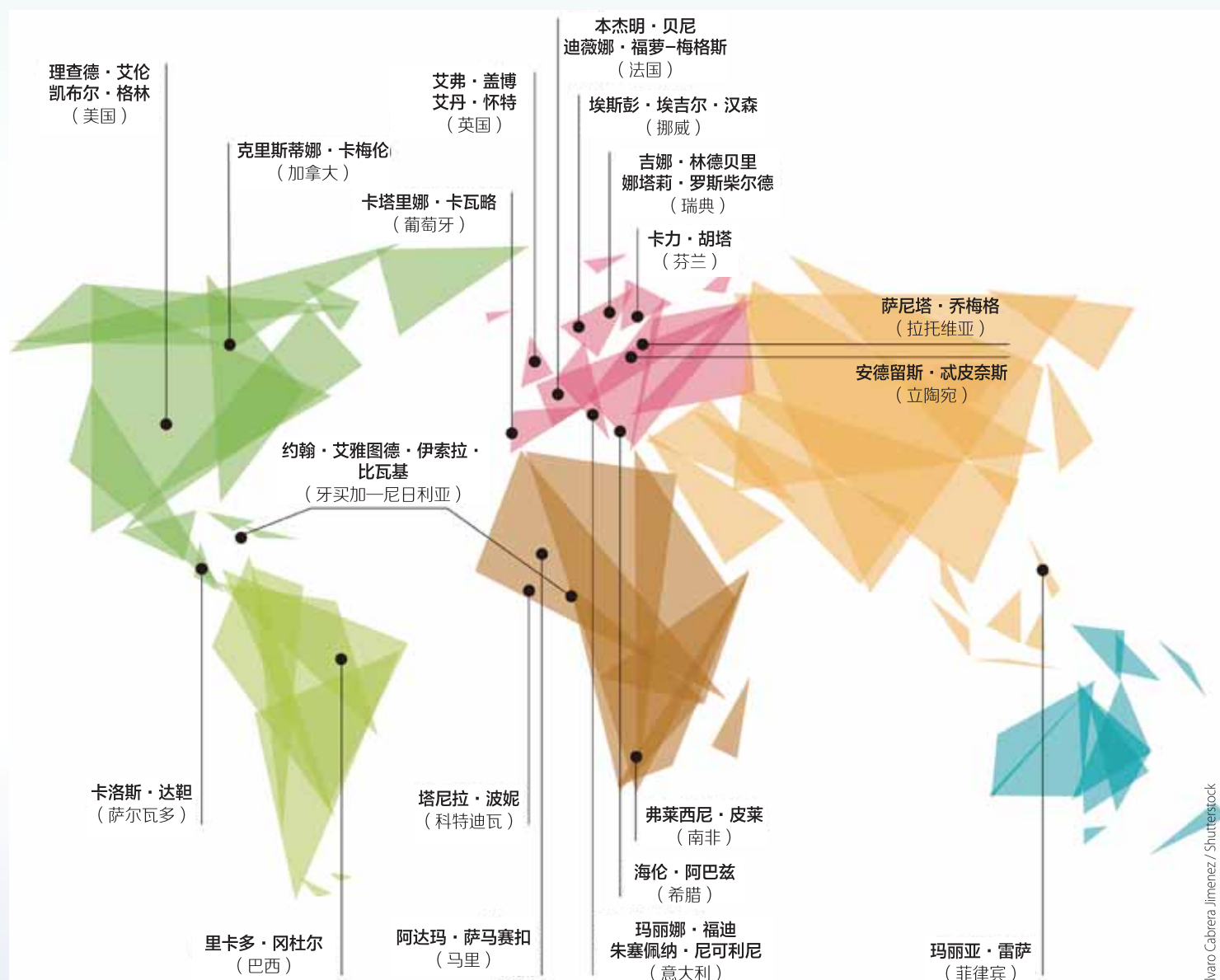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我们的作者



@ Alvaro Cabrera Jimenez / Shutterstock

2017 年第 2 期 (总第 2 期)

1948 年创刊

《信使》是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出版的一本季刊，目前有七种语言的版本，本刊主要分享了教科文组织所涉猎领域的一些国际事务，以及人们对这些事务的观点，以此来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愿景的实现。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信使》出版做出慷慨资助。

出版主任：埃里克·佛尔特

常务主管：文森特·德富尔尼

主 编：雅斯米娜·萨波瓦

制作与推广主任：伊恩·丹尼森

助理编辑：卡特琳娜·马尔可洛娃

数字编辑：马拉哈·伊布拉欣莫娃

数字建筑师：丹尼斯·皮扎利斯

编 辑：

- 英语：习拉兹·西德瓦
- 阿拉伯语：安妮莎·巴拉克
- 汉语：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 西班牙语：露西亚·伊格莱西亚·昆茨

- 法语：伊莎贝尔·莫查纳-布兰
- 葡萄牙语：安娜·露西亚·基玛拉西斯
- 俄语：玛丽娜·亚罗严

英语翻译：彼得·科尔斯和奥利维亚·富勒

图片编辑：达尼卡·比耶利亚茨

设 计：科林·海沃斯

免费阅读电子版：<http://zh.unesco.org/courier>

咨询与版权问题：The UNESCO Courier

7, place de Fontenoy, 75007 Paris, France

courier@unesco.org

© UNESCO 2017



使用条款：本刊经“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3.0 国际政府组织 (CC-BY-SA 3.0 IGO)”授权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igo/> (link is external)) 可开放获取。若引用该期刊内容，需接受并遵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放获取资料库的使用条款 (<http://en.unesco.org/open-access/>)。

现有授权仅限于文字内容，若使用图片，需事先申请许可。

期刊中的内容并不代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或其主权地区的合法地位，以及边界或分界线的界定的看法。

封面插图 © Selçuk

主管单位：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主办单位：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总 编 辑：张高里

执行主编：刘永淳

编辑部主任：刘香玲

责任编辑：王 梦 王克蒙

特邀译审：董方源

通信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 6 层 100044

电 话：(010) 68359101 (发行部)
68359719 (编辑部)

邮 箱：huangli@ctph.com.cn

印 刷：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市邮政局

国外发行：中国图书进出口 (集团) 总公司

电 话：0086 10 64258884

邮 箱：export@cnpi.com.cn

国内统一刊号：CN 10-1517/C

国际标准刊号：ISSN 2096-4064

定 价：36.00 元

信使

社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伊琳娜·博科娃
© Yulian Donovan

每当一种新的媒体形态出现时，它都会引发一场革命——印刷、广播、电视、互联网，都改变了社会面貌，改变了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and 自我管理方式。

每当一种新的媒体形态出现时，总会有一些声音冒出来，断言这种媒体将消灭之前的媒体——广播会消灭平面媒体，电视会消灭广播，而数字媒体会消灭所有以前的媒体。然而，在今天的媒体环境中，不乏各种信息传播方式之间的相互补充、相互效仿和相互影响的例子，它们放大的声音并互相回应交流。

我们从未如此频繁地交流过，从未如此大规模地交流过。新技术开辟了新的途径，使全世界的公民能够获得更多样化和更多来源的信息，并在信息生产中扮演一个新的角色——制造信息者。这些新形态的媒体也制造了新的障碍，并在监管和伦理方面提出了新的挑战。

信息来自哪里？信息是怎样产生的？谁来保证信息的质量？网络上来自各方的几十亿条信息交织在一起，我们如何辨别这些信息的真假？在极其混乱的媒体环境中，制作人、广播电台和用户的传统角色已不复存在。虚假新闻的产生与媒体受众受困于网络算法产生的“信息封闭罩”的风险，为言论自由和文化多元化的推进带来了新的问题。

大量开明观点的存在是社会民主发展的前提。不管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他们传播的信息质量是公众舆论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特别重视媒体和信息教育，将这两者视为 21 世纪公民的一项基本技能。

言论自由与通过文字和图片表达想法的自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基本原则之一，也是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核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敬业的新闻工作者和积极分子捍卫基本自由权，如记者达维特·艾萨克，201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吉列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获得者——他的故事将出现在本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中。

在过去十年间，有超过 800 名记者在扼杀言论自由的魔爪下牺牲。而最终被定罪的凶手只占十分之一。大多数凶手逍遥法外的事实是不可接受的，而且它进一步助长了暴力行为的恶性循环。这就是为什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致力于终止各大洲的新闻犯罪。言论自由是和平社会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是人们获得可靠信息的保障。

在这个“后真相”时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作用前所未有地重要。本期《信使》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来重申我们创办之初的承诺——支持信息和沟通，在人们心中播撒和平。

目录



广角

媒体：净化行动

- 5 新闻伦理再成焦点
艾丹·怀特
- 8 虚假新闻：
热点话题原声播报
- 10 培养批判性思维，抵制虚假新闻
迪薇娜·福萝-梅格斯
- 14 《晚邮报》直指脸书，
引出重要辩论话题
玛丽娜·亚罗严
- 18 拯救媒体，众筹的故事
安德留斯·忒皮奈斯
- 20 多亏网络，有此灯塔
卡洛斯·达靶
- 22 调查性新闻，风雨无阻
萨尼塔·乔梅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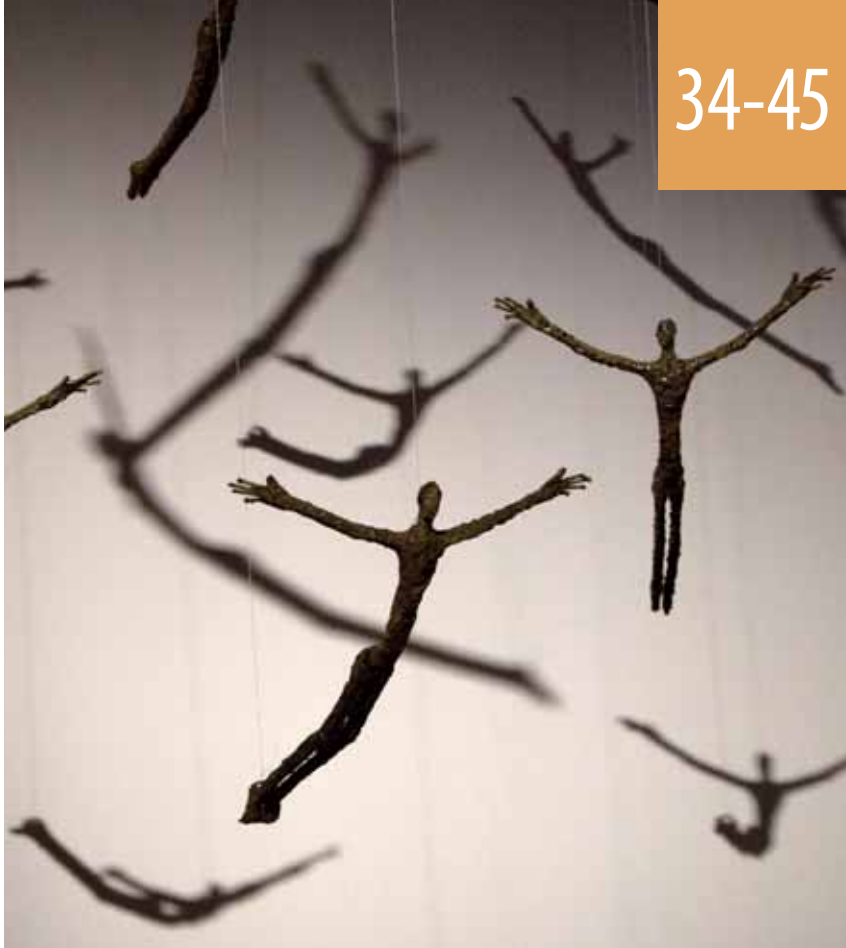


影像



我的面庞，我的土地

文字：卡特琳娜·马尔可洛娃
摄影：玛丽安·劳莫尼埃，保
罗·劳莫尼埃，贝尼



34-45

观点



人文性，或者说如何满足
人类对人文的渴求

35

阿达玛·萨马赛扣

本土故事的重要性

40

约翰·艾雅图德·伊索拉·比瓦基

城邦核心的诗人

44

塔尼拉·波妮



46-49

嘉宾



朱塞佩纳·尼可利尼：
好客是岛屿的天性

玛丽娜·福迪 担任采访



50-65



时事

51

达维特·艾萨克，一个必
须被释放的新闻自由象征
娜塔莉·罗斯柴尔德

54

重建文化遗址，态度转变
克里斯蒂娜·卡梅伦

58

早期识字能力，
熟练阅读的关键
海伦·阿巴兹

62

开放式教育资源：
合法自由共享，促进更好学习
凯布尔·格林



新闻

给青年发言权！

6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信使》新起点

70

展览

71



66-69



媒体： 净化行动



© Lukiyanova Natalia frenta / Shutterstock



新闻伦理 再成焦点

艾丹·怀特

数字时代我们对媒体质量和民主的追求，使新闻伦理的核心价值空前重要。新的法律可能带来潜在的新闻审查制度，但恪守伦理道德的承诺仍是建立公信力必不可少的。



© Jugoslav Vlahovic

艾丹·怀特说：“科技巨头们控制了公共信息空间，比如谷歌、脸书、亚马逊和推特，让信息在一个价值中立的环境中传播。”

新闻业已今非昔比。如今的新闻工作速度更快，压力更大，而且愈发复杂。媒体在经历艰难后认识到信息革命——虽然可以释放出巨大的潜能——是一把双刃剑。

新媒体可以在几秒钟内把新闻故事传给全世界，通信系统具有扩大社群成员凝聚力和见识的能力，传统的新闻业务营利模式却被打破了，其中很多甚至无法补救。

随着公益新闻营利能力的下降，新闻编辑部坚守着伦理底线。原本存在的问题——政治偏见、大企业的过度影响、各种成见和利益冲突——如今都被放大。

在过去的 15 年里，科技改变了人们的沟通方式和媒体的业务运营模式，使新闻业剧烈衰退。现在大部分人通过

手机和网络平台获得新闻。这些平台通过收集个人信息和榨取传统媒体的广告业务获利。

全球共鸣

数千家新闻机构相继倒闭，其中大部分为报社。同时有数以万计的新闻工作者失业。虽然言论自由的空间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但是随着传统新闻资源的萎缩，尤其是地方和地区一级，可靠可信的新闻来源渠道却变窄了。

五年前成立的新闻伦理网（EJN）力图增强新闻业在这场危机中的应对能力。

新闻伦理网由 60 多个团体组成，成员包括记者、编辑、出版业主和媒体

支持团体等。新闻伦理网旨在通过培训和实际行动来加强伦理道德和管理，开展了为新闻工作者开发一个曝光仇恨言论的测试，制定冲突报道指南和提供移民报告等工作，这些行动得到了全球新闻工作者的共鸣。

新闻伦理网植根于媒体，发布多国化的报道，并揭露媒体运作方式和监管难题，在新闻业界具有普遍的公信力。

尽管经济和政治环境日趋恶劣，新闻伦理网在这个不确定时期的调查中显示，全世界的新闻记者——不管是来自土耳其、叙利亚、埃及，还是来自巴基斯坦、印尼——都依然坚持真相，坚守伦理。



建立公信力

全球通讯文化处于混乱的转型期，建立公信力的担当是社会变革的宝贵财富。对于媒体人和所有为将来的安全通信而奋斗的人们来说，保护和提升新闻伦理的重要性是空前的。

虚假新闻、政治和企业宣传以及无耻的网络谩骂威胁着民主制度，是言论自由捍卫者、决策者和职业媒体人共同的敌人。新通讯环境中的数字技术滥用、不实的政见和过度的商业开发无不对更大范围的公共信息领域造成威胁。

在此背景下，新闻伦理网发起了一项讨论活动，主题是认同在道德准则约束下的新闻业在公信力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我们发现媒体业或大众对新伦理准则没有普遍的渴求。已经演变了 150 年的新闻报道核心价值，即准确、独立和负责，在数字时代依然适用。

新闻伦理网认为，我们需要与媒体受众及决策者建立新型合作关系，说服他们加强新闻道德建设，这种合作可以成为提高信息素养的典范。

基本原则

当下，不仅仅是新闻记者需要注意言辞、尊重事实，每个在公共信息圈内发言的人都需要注意伦理约束。

新闻伦理网认为新闻业的伦理价值，比如以事实为依据的传播、人道主义和尊重他人、透明和坦承错误，是每个人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社交媒体用户和公民记者。人们应该自愿遵守，而不是碍于法律的约束。

有些国家，甚至一些民主国家的政府，由于担心网络谩骂和虚假新闻，威胁要处罚没有去掉弹出恶意和危险消息的科技公司。这些措施会限制合法异议的提出和言论自由——如果这些公司不支持通行伦理，那么这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问题在于谷歌、脸书、亚马逊和推特等科技巨头们控制了公共信息空间，让信息在一个价值中立的环境中传播。他们不把专业新闻等公益性质的信息放在首位。对他们而言，新闻和其他信息在他们的平台内同等竞争，哪怕是一些没有受到监控的恶意谩骂。

运用算法吸引点击

利用复杂的算法和无穷的数据库接触数百万的订阅者，这种商业模式只有一个驱动目标——通过传播“病毒信息”的点击量来赚取广告费。信息是否道德、真实或诚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该信息是否具有煽动性，是否吸引眼球。

不管机器人如何复杂精巧都无法编入伦理道德观。最适合处理伦理问题的

人应该具有感知力。比如经过良好培训的、有知识的、有责任心的记者和编辑。

近期发生的标志性图片审查制度引发的愤怒（见 16 页），折磨和谋杀类视频的直播，大公司对其广告出现在恐怖主义、仇恨和儿童虐待网站中的抱怨，在这些丑闻发生后，科技巨头们已经承诺采取行动。但是这就足够了吗？

2017 年 5 月 3 日，在公众震怒于大量的有关谋杀、自杀和轮奸等暴力视频传播后，脸书老板马克·扎克伯格承诺雇用 3000 名内容审查人。公司原来有 4500 名“社区运营队伍”成员。

脸书拥有 20 亿用户，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内容审查人要对应大约 25 万用户。在不道德的、恶意的内容以及由不实宣传及虚假新闻引发的危险日益增长的情况下，这种监控手段只是杯水车薪。

利用隐私

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法是，科技公司承认他们属于数字时代的新闻发布者，并雇用大量被信息革命淘汰的有经验、有道德的新闻记者。大家都知道这些公司有足够的经济实力，2017 年初，有报道称脸书的市值大约为 4000 亿美元，而谷歌的市值超过了 6000 亿美元。他们都跻身世界上最富有的公司之列。

政治决策者和科技大佬们只会为这些问题说抱歉，却毫无实际行动。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无道德的政客们利用科技破坏民主政治、干扰选举。他们的战略中充斥着用恶意谎言装饰的虚假新闻。



@nickgentryart (www.nickgentry.com)



“不管机器人如何复杂精巧都无法编入伦理道德观。”艾丹·怀特解释说。“第13号肖像”，作者：英国艺术家尼克·金特里。

近来万维网的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爵士揭露了这种偏航。这位英国科学家和学者警告称，网络世界正深陷于政府和信息公司的控制之中，对个人隐私的过分利用正在扼杀网络。

他在批评中强调了宣传不实政治信息的破坏性和危险性。

在一封公开信中（2017年3月12日，万维网诞生28周年日当天发布），蒂姆·伯纳斯-李爵士提到了2016年的美国选举：“脸书每天发布多达五万种不同形式的广告，基本无法监控。民调显示在美国和世界各地都有滥用政治广告的情况，比如把选民引导到虚假新闻网站或者劝说他人不要投票……这是民主政治行为吗？”

曝光虚假新闻

这个问题值得关注，它在2017年5月法国总统大选前夕再次被提出。当时一些网络黑客盗取了电子邮箱账户，发表了成千上万份有关埃马纽埃尔·马克龙这位最终当选者的机密文件，其中很多都是虚假的。

面对这一大堆文件，记者无法检查，无法核实，也无法揭示真相，因为法国法律禁止人们在投票前最后几小时公开讨论竞选信息。但是这些信息却在社交媒体上自由传播。

追求时效而牺牲质量是新闻报道的通病，但是有道德的新闻从业者勇于承认错误。更重要的是，因为有道德的新

闻依据的是事实，追求的是公民目的，它可以为政策的制定提供路线，用来建设安全可靠的信息空间。

艾丹·怀特（英国）新闻伦理网主任，《告诉你真相：伦理新闻倡议》（2008年）的作者，书中对全球新闻伦理问题进行了回顾。2011年3月之前，他一直担任国际新闻工作者协会秘书长，任职时间长达24年。他还是国际新闻安全协会和国际言论自由交换协会（IFEX）的创立者之一。



虚假新闻： 热点话题原声播报

虚假新闻或虚假消息由来已久。但如今，随着数字媒体的崛起，虚假新闻的散布更加容易、快速。有责任心的新闻工作者和可靠的新闻机构应遏制虚假新闻的蔓延。新闻工作者们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我们采访了其中一些人。

艾丹·怀特

新闻伦理网主任

随着世界各地的民主进程受到越来越多的干预，就如何揭露和消除虚假新闻的争论肯定会加剧。但是，由于人们一开始就对这种现象及其起源产生误解，不明白它为什么会产生危害，故而使讨论陷入混乱。

为了阐明这个问题，新闻伦理网为“虚假新闻”下了定义：“以欺骗和误导他人相信谎言或怀疑可证实的事实为目的而故意编造和发布的信息。”根据这个定义，很容易就能把政治鼓吹、“另类”事实、恶意谎言和真正的新闻区分开来。

弗莱西尼·皮莱

南非《赫芬顿邮报》主编

虚假新闻毒害了我们赖以生存的行业。由于虚假新闻的存在，大众开始怀疑所有的新闻。虚假新闻确实破坏了受众和媒体之间的关系。

卡力·胡塔

芬兰《赫尔辛基日报》外交事务编辑

我们很容易夸大虚假新闻对新闻业的影响。我不想轻率地下结论——但虚假新闻确实是对社会和制度的一种严峻挑战。讲故事只是一个幌子，而它的主要目的是摧毁机构的公信力，包括但不限于新闻业。

艾弗·盖博

英国苏塞克斯大学新闻学教授

虚假新闻一直存在——自从人们意识到媒体对公众意见的影响力以来。而当今存在的问题是，谷歌和脸书等社交媒体和平台纵容了虚假新闻的传播，范围之大、速度之快史无前例。

虚假新闻对新闻业的冲击在于，区分虚假新闻和真实新闻的难度较大，但同时这也使得真正的新闻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只有负责的新闻工作者才能有效揭露虚假新闻。我认为眼下，虚假新闻给新闻人的工作带来不少麻烦，但是长远来看，他们将以获得更广泛的认同和重视。

里卡多·冈杜尔

CBN、巴西无线网络新闻主任

虚假新闻强化了新闻业的传统使命，即为社会和公众提供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我们必须在这个核心价值基础上巩固我们的使命，努力将争论的焦点变得清晰，努力向公众展示什么是真正的事实和争论点。



© Cristó Salgado

吉娜·林德贝里

瑞典广播国外新闻部主任

所有关于虚假新闻的讨论都在影响着媒体受众，因为大众难辨真伪，失去了安全感。作为专业记者，我们必须做好本职工作——我们核查事实，寻求答案，（新闻收集）方法透明。

卡塔里娜·卡瓦略

葡萄牙全球媒体集团主编

虚假新闻不属于新闻业。也许我们应该思考我们（主流媒体）对新闻业做了什么，使得虚假新闻这么容易被公众接受，制造虚假新闻又是如此容易。我想我们应该自我反省一下，我们是否做了正确的事情，我们是否以正确的方式行事，我们是否在新闻报道中坚守道德——这些本可以阻止虚假新闻获得权力和影响力，并使它停止现有的发展。

社交网络中的谎言

玛丽亚·雷萨

菲律宾 Rappler 的联合创始人和总裁

Rappler 是一个致力于调查性报道的社会新闻网络，已经记录了至少 300 个在菲律宾传播虚假新闻的网站。我们在一项调查中监控了可疑脸书账户的增长情况，这些账户在 2016 年 5 月菲律宾竞选期间把虚假新闻植入到竞选页面之中。

我们用三个月的时间人工检查了这些脸书账号发布消息的真伪。

我们发现一个由 26 个假账户组成的网络窝点能够影响接近 300 万个脸书页面。我们还发现，截至 2016 年 11 月，大约有 5 万个脸书账户可以被用于在某个活动中支持或反对菲律宾的政界人士或个人。有一个虚假账户与 99 万多来自支持某一政治领导人的团体的成员有联系；还有一个虚假账户则与大约 380 万来自海外菲律宾机构和买卖组织的成员有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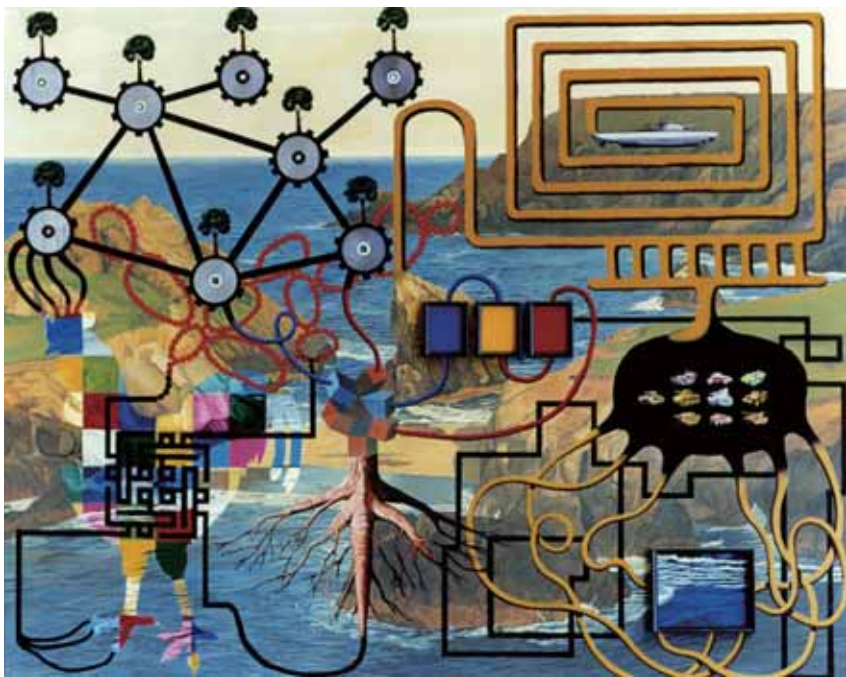
菲律宾有大约 5400 万脸书用户，社交媒体是一种强大的武器，会被用来压制异议和塑造公众舆论。Rappler 经历了无数次来自互联网的攻击，包括来自脸书账户的攻击，这些账户是为了骚扰记者和投稿人而专门设立的。

这更坚定了我们揭露谎言和阻止虚假新闻传播的决心。

培养批判性思维， 抵制虚假新闻

迪薇娜·福萝-梅格斯

从网上冲浪、网上聊天发展到以操纵和破坏为目的的数据挖掘，大众传媒领域的数字化革命日益凸显了媒体和信息素养的重要性。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媒体及给予媒体合法地位的政治和伦理基础的教育。



© Oscar Sec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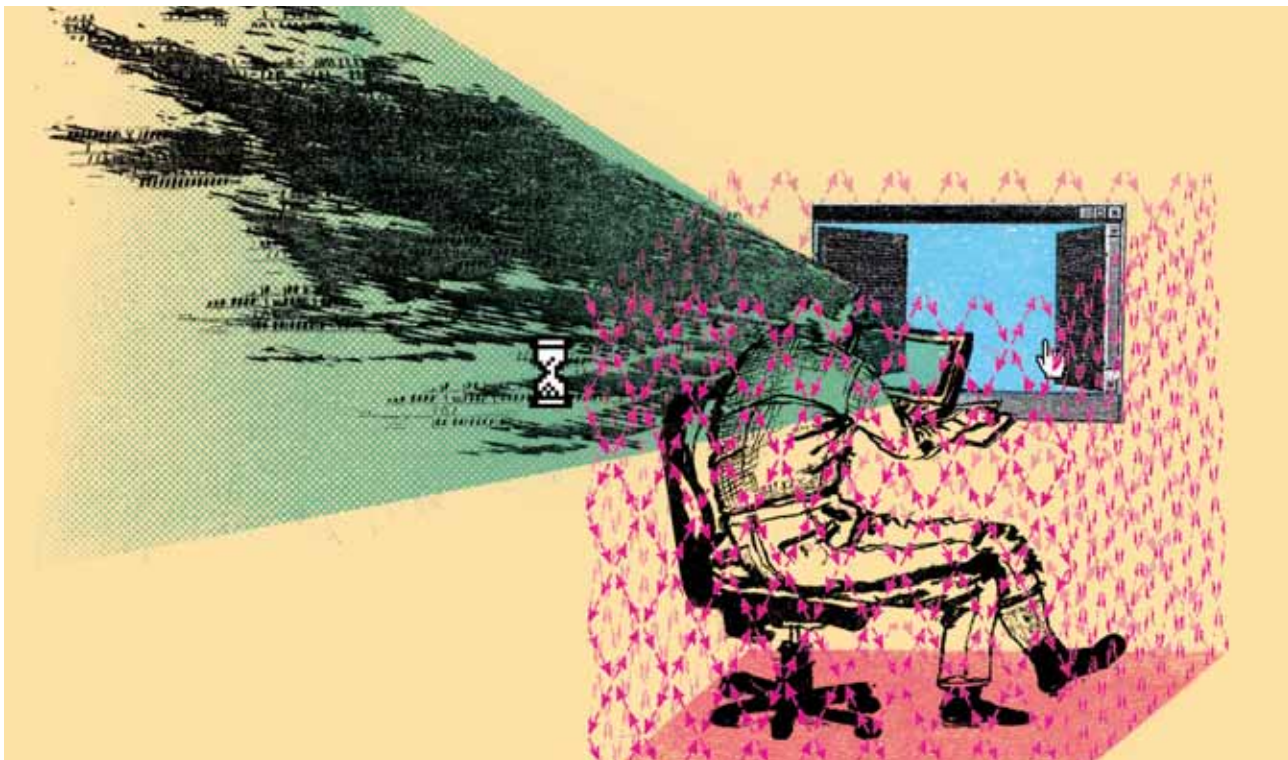
“迷宫与乌托邦”系列中的“双重神秘岛”，作者：西班牙画家奥斯卡·塞科。

最近人们常常求助于媒体与信息素养（MIL），因为媒体受到各方面的威胁，不管是在极权政治下，还是在民主制度下。2015年1月7日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的遇袭事件为人们拉响了警报，讽刺漫画这种最传统的媒体形式都遭到攻击。

我当时担任媒体和信息素养中心（CLEMI）主任。我们需要准备第二天的学生返校，为教师和家长提供帮助。我们当时的做法和以往大灾难过后的应对方式一样，在档案中查找了有关讽刺漫画和宣传的教育材料，在网络上发布媒体资源（参考网站、新闻评论、一系列头条文章）。我们还发表了一篇以前没发表过的文章“我们可以嘲笑一切吗？”这是我们中心于2014年对漫画家和记者 Charb（他的真名叫Stéphane Charbonnier）的访谈。Charb在这次袭击中遇难。

这场危机显示了媒体与信息素养的力量，也暴露了其局限性。我们准备了足够的资源，但没有预料到社交媒体的影响。

如同数字化之前的媒体，媒体与信息素养应该向前迈进，将数据对媒体的影响纳入考虑范围。数据是这样影响媒体的：它根据人们的浏览记录，利用算法推送信息，把人们封闭在“过滤封闭罩”里，以强化符合预先构想的偏见思想；它通过内容货币化（阅读点击）减少思想多样性和多元化；它在用户无法掌控的情况下使用用户浏览记录，侵犯用户隐私和基本自由。



© Patric Sandri

媒体与信息素养最近受到虚假新闻危机的撼动。虚假新闻是一种谣言、片面宣传和阴谋理论的混合体，虚假新闻比虚假信息更难识别，虚假信息通常只是可识别的谎言和真相的混合体。虚假新闻属于虚假信息范畴，但是它的危害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信息技术使它超越国家和媒体的界限，像病毒一样蔓延。

媒体与信息素养必须考虑数字变革，它已经从“蓝色大陆”向“黑色大陆”转变。换句话说，数字化革命已经从网上冲浪，在 GAFAM（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微软的首字母缩写）控制的平台上聊天，发展到了以大规模操纵和破坏为目的的有害的数据挖掘。

从这个角度讲，识别网上宣传很不容易。因为这是一个破解一种颠覆性意识形态的问题，技术上得到创新，代表的却是一场自相矛盾的保守的全球革命，它的目的是在现有的政治体系中制造混乱，而不是建立一个进步的政治思想体系。

八卦的回归

媒体与信息素养因此不得不重新思考媒体与给予媒体合法地位的政治和伦理基础。我们必须重新审视社交媒体的角色和承载的信息交流，我们还应重视的是随着数字化媒体的发展，过去的媒体受众正在转变成新的信息共享和诠释群体。社交媒体上新兴的八卦趋势并非无关紧要，也不应该被轻视。暗地里混杂了谣言、半真半假的言论和小道消息，使原本私人化的信息公开化。它将可靠性置于事实之上，此处的“事实”被理解为由精英制造，远离日常生活和本地人所关心的事情。

社交媒体所传播的信息没有确凿可靠性，它以谎言推理真相，或真相并不清晰。因此，当所谓的黄金标准信息系系统不起作用，人们称社交媒体为“后真相”，但这种立场缩减了寻找真相的范围，拒绝寻求另外的真相。这再次凸显了客观事实和具有影响力的评论意见之间的永久新闻斗争。

解读网络上的政治鼓吹是很复杂的过程。迪薇娜·福萝-梅格斯说，新一代的年轻人必须学会同时担任“探险者、分析者和创造者”的角色。

在信息传播学中，八卦属于社会关系范畴，它满足了重要的认知功能：环境监督、通过共享新闻帮助决策、使团体在特定情况下价值观和谐……这些功能传统上赋予了媒体合法地位，但现在人们认为媒体是有缺陷和有偏见的，这是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传播八卦的症状。这与其说是社交媒体之过，不如说是现实中公开辩论负责人之过。

在当今动荡的政治局势中，社交媒体在调节社会叙事一职上，正起着修正意义的作用。它们曝光违反社会准则的现象，尤其是当政治机构夸口其透明度时。秘密不再安全。报纸听命于政党，打破了客观性准则，要么是同意要么是反对，意见僵化。公众不信任这种两极化的“事实”，但又被真实性策略误导。后者与由受众构成的社群成员建立了紧密的信任关系，目的是让他们以



“Data. Path” (2013)，作者：日本艺术家池田亮司。他的创作理念是：我们的世界被数字化网络所渗透，这幅作品将这个无形的网络变得可见、可触。

透明度为原则参与到辩论中来。就这样，社交媒体用客观性伦理反对真实性伦理。

探索者、分析者和创造者

社交媒体与虚假新闻为媒体与信息素养提供了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媒体与信息素养要求具备一种基本能力——批判性思维。但是这种批判性思维必须对数字化的附加价值有所了解：参与、贡献、透明度和问责制，当然，还有虚假信息 and 影响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批判性头脑可以通过训练和培养获得，它还可以成为抵抗片面宣传和阴谋理论的一种形式。成年人在为年轻人提供保护的同时，还应该培养他们的责任心。应该让他们质疑自己对社交媒体的使用方法，让他们意识到受到批评是因

为自己的使用方法可能造成某种后果。一旦他们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我们也应该信任他们的道德感。

我在媒体教育网站开设了大型网络开放课程（MOOC）“如何使用媒体”课——MOOC DIY MIL（曾获得201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体与信息素养奖），课上我对学生提出了三个重要角色：探险者、分析者和创造者。探险者要了解媒体和数据；分析者运用概念，如核查（信息）来源、交叉数据、尊重隐私；创造者创造自己的内容，思考自己的选择会产生什么后果，然后决定是否发布这些内容。

课上诞生了“推特上的公民记者”和反阴谋论的“HoaxBuster”等项目。这些都是为了使年轻人获得对媒体与信息素养的重要的批判思维反应能力，学会如何避开仇恨性言论、非自愿的浏览



纪录和虚假新闻等陷阱。还有其他一些倡议，其中有些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牵头，包括创立了媒体与信息素养全球合作伙伴联盟。MIL 点击也是最近的一项举措，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获得媒体与信息素养。

扩大媒体与信息素养的影响力

但是媒体与信息素养本身也要用批判性思维去防备媒体。事实证明，各大新闻机构最具影响力，其中不乏在不经证实的情况下传播谣言的，推特就是其中之一。最早出现虚假新闻的社交媒体是脸书，这些新闻几乎没有什么真实性，主要是因为新闻工作者太急于发表独家轰动新闻，而不追求其真实性，这与业余工作者的做法别无二致。而辟谣所产生的影响之大，远不及谣言！

因此扩大媒体与信息素养仍然存在挑战。我们必须说服决策者，必须培养职业培训工作者（教师和记者）。在新索邦大学，我有一个在国家研究社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席“知道如何生活在可持续数字发展时代”框架下的研究项目“TRANSLIT”，对欧洲的公共政策进行比较。项目研究表明，协会和教师们在欧洲做的大量资源和培训主要是他们自己倡议的，而非大学资助的。该研究还表明，尽管媒体与信息素养列入了众多的国家教育项目中，公共政策还是脱节了：极少有跨部委机制；极少有或没有监管机构；极少有或没有多方利益间的协调。最终这是一种混合治理方式，根据不同国家有三种现行模式：发展、代表或解约（迪薇娜·福萝-梅格斯等，2017）。

伦理进步

好消息是记者们开始意识到该问题，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职业道德，并认识到媒体与信息素养的价值。伦理进步可以帮助教师重新调整媒体与信息素养的位置，提供有效资源，融合数据和媒体。一些行动已经开始，恢复了深度报道的价值，显示只有通过数据新闻业才能找到的一些信息。

“巴拿马文件”这一巨大的机密文件泄密事件有助于提高政治生活道德水准，并使人们重新对记者职业产生信任。其他行动的目的则更加明确，用数字化手段打击虚假新闻。其中应该提到的是法新社的博客《制造：信息的幕后》（它揭示了一个大型新闻网络的幕后故事），还有《世界报》的 Décodex（根据不可靠性排行），谷歌的 RevEye（点击三次就能确认图像的真实性），Spicee 网站和它的 Conspi hunter（揭露阴谋论）。

为了充分发挥作用并建立受过教育的公民身份，媒体与信息素养的批判性思维也应该应用到社交媒体的地缘经济领域。GAFAM 这些数字平台受美国加州法律管辖，长期以来拒绝归入媒体公司之列，以逃避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及公共服务的相关义务。控制算法表明他们能够对有偿内容进行编辑掌控。但控制算法由人设计，他们的控制算法并不代表透明性和伦理道德。

GAFAM 这些巨无霸媒体迄今为止打的是自律牌：他们制定自己的规则，自己决定撤销有可疑虚假新闻的网站和账户，没有问责制。但他们无法长期抵抗人们对负责任模式的需求，如果想留住在线社区对他们的信任，他们的运作方式可能是“公共运输者”和“公共受托人”之间的杂交品。在线社区也可以组织起来，甚至绕过他们，在记者的监管下运行，例如 Décodex 所做的那样。从数字逻辑上来讲，共同设计一种拥有新闻伦理和基本自由的算法是将来可行替代方法之一。

迪薇娜·福萝-梅格斯（法国）新索邦大学信息与通信科学教授。教科文组织“知道如何生活在可持续数字发展时代”教席。她出版了20多本书，其最新著作是与韦莱兹及弗洛雷斯·米歇尔合著的《欧洲媒体与信息素养公共政策：跨国比较》（伦敦，Routledge，2017）。



《晚邮报》直指脸书，引出重要辩论话题

© Photo Nick Ut. AP/NITB SCANPIX



《晚邮报》头版头条刊登了主编埃斯彭·埃吉尔·汉森致脸书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公开信（2016年9月8日）。

玛丽娜·亚罗严

社交媒体网站在新闻传播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引起了多方关注。《晚邮报》（挪威）的埃斯彭·埃吉尔·汉森和脸书的理查德·艾伦所属不同的行业，如今却面临着类似的挑战。

这是一张标志性的战地摄影作品（见第17页图）：黑白照片中，一个九岁的小女孩赤裸全身，哭喊着逃离爆炸现场，脸部因痛苦而扭曲。这张荣获普利策奖、名为“战火中的女孩”的作品是1972年，越南裔美国摄影师黄功吾在凝固汽油弹轰炸下的越南村庄中所拍摄的。2016年，脸书以“不适宜的内容”为由封杀了这张照片，引发了一场争议。

“我给马克·扎克伯格写了一封公开信，告诉他我是不会妥协的。”埃斯彭·埃吉尔·汉森回忆说。汉森是挪威最大的报纸《晚邮报》的主编。他也在脸书上分享了“战火中的女孩”，却收到了脸书永久禁止的警告。《晚邮报》的头版大幅刊登了汉森的公开信，加粗的标题赫然在目，直指脸书制定的规则：首先是“不能区分儿童色情图片和著名战争照片”，然后还“拒绝任何争辩”。该公开信获得了大量支持，并触发了一场有关脸书复杂的审查规则和通

过新闻推送算法进行内容控制的激烈讨论。

脸书在全球拥有20亿用户，向新闻网站引流的能力甚至超过了谷歌。脸书已经发展为新闻传播的重要角色，但它依旧把自己定位成“技术平台”，不愿正式承担这项责任。汉森认为，脸书可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媒体网站，相应地，马克·扎克伯格就变成了“全球最有权力的主编”。他说：“我在信中提醒扎克伯格，这个称号与责任同在。他拥有的不单纯是一家科技公司，更是一家媒体公司。”正是鉴于这一点，汉森认为因裸露而屏蔽一张标志性的摄影新闻作品是一个有失妥当的编辑决定。

每天都有数百万人在脸书上发布各种内容，使逐条筛选信息的工作变得难上加难。脸书负责欧洲、中东和非洲公共政策的副总裁理查德·艾伦辩护道，根据脸书的通用指导政策，追踪并删除所有未成年裸露内容是强制规定。

但是，他承认这项政策未能涉及



© Nick Ut / Sipa Press



“战火中的女孩”这种特殊情况。在2017年3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的“受到抨击的新闻业”专题讨论会期间，他代表脸书发言：“我要说明的是，其实我们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当出现始料未及的新状况，我们都会问自己，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要改变原有的规则吗？”

5月，脸书宣布将为原有的4500人“社群运营团队”新增3000名成员。脸书还新出台了更加灵活的政策，要求内容审核员对新闻进行特殊对待。艾伦说：“一些公益性质的图片中偶尔会出现裸体儿童，在这种情况下，要

征求当事人的意愿，而不是用常规的政策处理。”

算法——新时代的“主编”

在编辑决策方面，脸书和传统新闻媒体之间几乎没有区别。汉森坚持认为：“福克斯新闻的主编以什么样的方式对福克斯新闻内容负编辑责任，马克·扎克伯格也要以同样的方式对脸书内容负编辑责任。”

挪威插画师英奇·格罗敦借助标志性摄影作品“战火中的女孩”谴责脸书的“不适宜的内容”审查制度。照片中九岁的女孩叫潘金淑，以“逃离凝固汽油弹的女孩”为人们所熟知。自1994年以来，潘金淑一直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亲善大使。

“有些图片会引起人们的不适，但正是这些图片，能够在民主社会中增强人们的认识。”

两者之间唯一的区别就是，传统媒体编辑不会使用受到很大误解和存在争议的新闻供应算法。

“我们保留我们的原则。用户们会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艾伦阐述脸书的政策时说道。然而，算法一直在影响脸书 1.28 亿日常活跃用户的阅读习惯（2017 年 3 月），也就是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阅读习惯。该网站的审查工作包括审阅并分析所有用户在前

一周发布的所有信息，兼顾他 / 她赞过的每一个网页，他 / 她所属的所有群组，以及他 / 她所关注的每一个人。然后，根据一种严密的、不断演变的公式，算法根据用户的关注程度将发布的帖子进行精准排名。

然而，这种算法的特性会使它变成一种有争议的、甚至有危险的工具。“算法可能会产生所谓的‘信息过滤罩’，它会强化我们这个时代的负面趋势，即导致社群的分化更加严重，”汉森说，“人们会更加闭塞，他们只收到他们想要的信息，只和志同道合的人交流。”从这个角度来看，算法对信息进行分类的选择标准变得至关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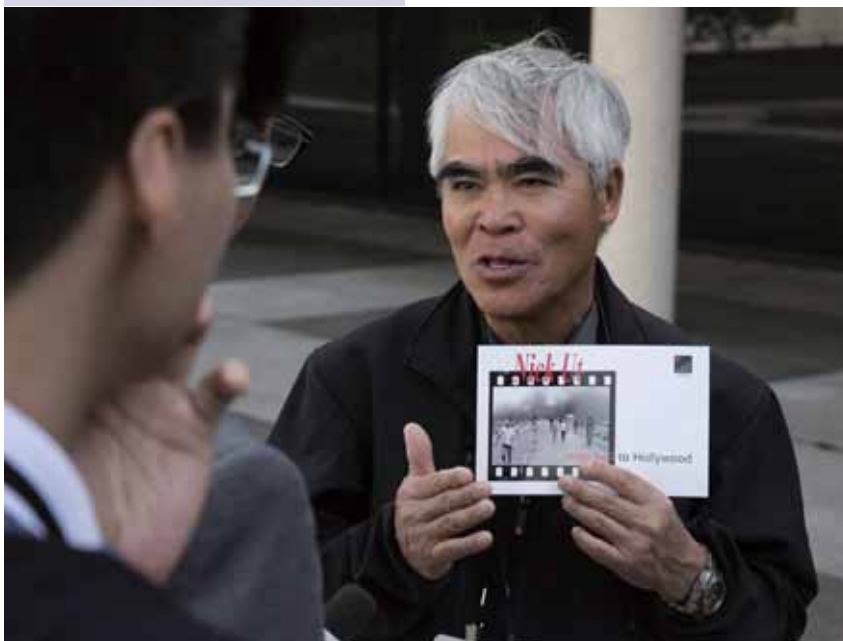
艾伦对新闻推送和期刊订阅进行比较，否定了脸书向用户强行推送内容的做法。根据他的说法，这种算法仅仅考虑以最便捷的方式为读者安排期刊。而问题在于新闻推送的来源太多。“我们发现人们会订阅上千种推送来源，但是他们只有阅读其中的 20 种的时间，”他说，“1000 种推送来源仍然存在，但是这显然会产生一个选择的过程，因为我们通常只选择出现在前面的那些消息。”

为读者挑选更感兴趣的信息的做法有潜在的问题。按汉森的说法，“对于网飞（设在美国的流媒体服务公司）视频，这种策略还是比较实用”，但是“对于信息在社会中自由传播，这种原则尚有疑问”。

虚假新闻——真正的解决方案？

从积极的方面来说，社交媒体网站确实突破了障碍，让人们更容易表达自己的想法。汉森回忆说：“当我写信给马克·扎克伯格的时候，我只是在一个小国家的小报纸上发表了这篇文章，但这则消息迅速被传播开来。讽刺的是，我认为正是脸书这一平台使我的文章广

2016 年 4 月，美国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 LBJ 总统图书馆，著名照片“战火中的女孩”的拍摄者黄功吾在越南战争峰会期间接受记者采访。





© Ruben Oppenheimer



为流传。”汉森的报社在脸书上有超过34万的关注者。然而，他紧接着承认，赋予每个人发布信息的机会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导致不实信息的传播。“网络时代，虚假信息很容易误导大片人群。我想知道，整个社会是否已经为这些令人担忧的趋势做好了准备。”

2016年，脸书卷入一系列虚假新闻相关的丑闻，被指控通过散布虚假新闻报道，并通过“信息过滤罩”将选民与来自各方的意见隔离开来，以影响美国总统大选。一项分析显示，总的来说，在脸书今年的2150万条分享、反响和评论中，有关美国政治的虚假新闻的就占了1060万条。在短短两个月内，一条有关前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的假

消息就产生了210万条评论、反响和分享。

无怪乎，脸书为了遏制各方的批评，推出了一个事实核查修正程序。从2017年5月开始，所有被用户标记成不可靠的消息都会由独立的真相核查专家进行复核，并贴上“有争议的”标签。“我们不打算删掉这些内容，”艾伦强调，“一方面，我们不想成为真相的裁定者，也不想对内容进行编辑。另一方面，我们想建立一个信息畅通的社群，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

汉森认为关键的问题是脸书是否真正承担这种责任。他赞扬脸书在他发表《晚邮报》公开信成为公众焦点后采取的积极改进措施。“马克·扎克伯格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表示，这封公开信引发的争议令他震惊，并使他认识到有必要改变脸书的运作方式。”

这种领悟和随后的改变至关重要，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对传统媒体产生广泛影响，并逐渐占据我们日常生活的过程中。

一封引发变革的公开信

“……马克，请注意问题的严重性！首先，你制定的规则不能区分儿童色情图片和著名战争摄影作品。其次，你在执行这些规则的时候，不为良好的判断能力提供争辩的机会。最后，你甚至屏蔽了对此决定的批评以及相关的讨论，还惩罚那些敢于提出批评的人……”

自由、独立的媒体在发布信息、甚至是图片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任务。有时候这些内容会引起不适。统治精英们，甚至是普通民众都不忍看到或听到，但可能恰恰是这个原因，使媒体的任务显得尤为重要……

在发布信息时，媒体有义务对每一条都予以谨慎考量。这或许是一个重担，但每个编辑都必须权衡利弊。全世界每个编辑都有这种权利和义务，贵公司编写的算法也不应该破坏这种责任。

脸书的使命宣言中写道，你们的目标是‘使世界更加开放，联系更为紧密’。但事实上你们却在完全肤浅的认识上履行这一使命。如果你们不想区分儿童色情图片和战争纪实照片，那么只会助长愚蠢行为，不会拉近彼此的距离。

硬说有可能创造全球通用的信息发布规则，只会蒙蔽人们的眼睛……”

（摘自2016年9月8日《晚邮报》头版，埃斯彭·埃吉尔·汉森致马克·扎克伯格的公开信。）

拯救媒体，众筹的故事

安德留斯·忒皮奈斯

数字革命为传媒业带来的影响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新闻工作者接受新技术，重塑自我，尝试新的商业模式，那么他们会是适应新媒体环境的最佳人选。立陶宛网络自媒体频道自由电视台（Liberty TV）的故事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数字时代已经到来。如果你属于传媒业的保守派，那么你极有可能不喜欢它。传统印刷媒体和电视被数字革命弄了个措手不及，在技术、资金和创造性这几方面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他们能够跟上数字化的浪潮吗？不好说。但是他们别无选择——不能跟上潮流，只会被淹没。

互联网诞生至今不到 30 年，由于能够提供免费、光速获取的信息，成为了现代社会最让人上瘾的“毒品”之一。

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保守派又遭受了社交媒体浪潮的冲击。这波冲击比互联网的冲击更强大、更猛烈。社交媒体公司占据了上风，而付费报纸和杂志的订阅量日渐萎缩，电视频道也逐渐落在成千上万的新闻网站之后。

突然之间，大家都能自成媒体——摄影师、编辑、作家、记者和推广人……这些工作通通都可以由一个人完

成。信息的守门人看到他们的大门轰然倒塌，他们失去了最重要的特权：决定资讯的重要程度。

2016 年 11 月，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最高公职，将社交媒体无孔不入的本质体现得淋漓尽致。曾经决定民意愿的主流媒体对特朗普充满仇恨，但是为了不在读者和观众面前自毁长城，只好屈服于特朗普的意愿。于是，唐纳德·特朗普成了历史上首位被社交媒体捧上宝座的总统。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明星

社交媒体崛起之前，曾被保守派蔑称为年轻人的玩具。YouTube 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视资源库和视频托管服务网站，自身几乎不创建任何内容，但是全球所有想要成为明星的人都将其视为安身立命之所。不管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任何人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实现梦想——成为歌手、大厨、拳击手、媒体明星。人们在这个完全免费的无限空间里自由驰骋。

PewDiePie（本名菲利克斯·阿尔维德·乌尔夫·谢尔贝格，1989 年 10 月出生在瑞典），是一名网络喜剧演员兼视频制作人。他是 YouTube 的无冕之王，拥有将近 5500 万的订阅者。立陶宛最成功的两名 YouTube 用户是 Whydotas（Vaidotas Grincevičius）和 The dvinas（Edvinas Navikas），他们拥有的订阅者超过了四个国家电视频道的订阅者总数。



当然，新媒体承载的内容并非都是正面的，有时候会伴随沉重的代价。这里充满了虚假信息、虚拟聚众私刑、网络暴民和毫无根据的指控——这是一场任何人都能参与的混战。所有信息不经过滤和编辑，也大可不必讲究克制和礼节。

受互联网发展所迫，我们正处在媒体变革的阵痛期。作为新闻记者，我们必须主动接受变革，摆脱一切顾虑，向数字化转型。鉴于自身的专业素质，我们比现今大多数新手更有优势。

新技术带给人们空前的自由，尤其是在那些政府管控新闻的国家。现在是你表达观点的最佳时机，你会得到全世界的回应。与受众互动至关重要——即时受众反馈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观众众筹

新闻业的改革可以看作是一个正面发展：为了不被淘汰，我们不得不开发创造力，打造新的商业模式。我的频道就是本着这种原则而生存的。

我在立陶宛电视台的节目被取消，震惊之余，我决定反击。2016年9月，我创办了自由电视台。这是一个完全独立的网络电视频道，由观众众筹创建。

我们每个月播出15期节目，将在2017年秋天至少再增加3期。节目内容包括立陶宛和俄罗斯的政治讽刺剧、脱口秀、调查性新闻、政治分析和题材积极正面的纪录片。

我们的员工（由全职和兼职的专业人员组成）包括了完整的技术班底，从编辑到摄影师、新闻记者和编剧。还有一个小的管理团队负责频道的推广。我

2017年5月23日，在立陶宛最大的港口城市克莱佩达，安德留斯·忒皮奈斯主持本季“坚持！”最后一次录制现场，吸引了2000多名现场观众。

们的王牌节目都是在剧场里用高清摄像机拍摄的，拍摄现场一般有200到250名观众。

我们的电视台是非营利性的，必须确保收支平衡。这要求我们厉行节俭。我们大部分设备都是租用的，或是由我们雇用的专业人员提供。我们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在线完成的，我们只有一个很小的办公室，用于开会和剪辑。我们计划在2017年秋天换一个更大的办公室。

我们在10天里达成了1.5万欧元的财务目标，及时赶上了首发时间。第一个月，将近5000人参加了众筹。订阅者们可以自由选择付费期限，我们不

强制续费。对于一个人口不到300万的国家来说，这样的众筹成绩是非常惊人的。我们也得到了商业赞助，赞助商愿意提供不设附加条件的资助。

一种经受考验的商业模式

把我和团队的命运交到公众手里，是我新闻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赌博。他们愿意为一些原本免费的东西付费吗？但是如果他们不付费，这些东西将不复存在。人们是否有足够的公益精神在经济上支持一个独立媒体？立陶宛的媒体专家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我们还是选择硬着头皮向前冲。

2017年3月，我们动员观众的力量，说服政府将税收的百分之二投给自由电视台。我们好奇这个倡议能为我们筹集多少资金。

四个月后，自由电视台成了YouTube上立陶宛最大的媒体实体，其中一些节目达到了六位数的播放量，在收视上打败了主流媒体最受欢迎的节目。八个月后，媒体专家承认他们错了，开始报道我们的扩张计划。

我们的创新商业模式，跟上了数字革命的潮流，但不光只有我们得益于这种模式。在荷兰、瑞士、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都有类似的新闻众筹项目。

这种新模式运营起来并不容易，在将近20年的职业生涯中，这是我做过的最艰难的工作。但作为一个新闻记者，这是我唯一愿意继续走下去的路。正是数字革命给了我这个机会。

安德留斯·忒皮奈斯 立陶宛记者兼作家。他在2016年创办了自由电视台，是电视台王牌节目“坚持！”的主持人。他也是立陶宛社交媒体明星之一，拥有超过13万的脸书粉丝。

多亏网络，有此灯塔



© Fred Ramos

卡洛斯·达韞

由于互联网和社交网络的渗透，谣言和虚假新闻开始大量充斥，新闻业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危机。然而，这些相同的空间和工具可以也应该被用来创造更好的新闻业，如萨尔瓦多网络先锋报纸《灯塔报》那样。此文是对《灯塔报》20年历史的回顾。

我们创刊时或多或少是被迫的。1998年，萨尔瓦多刚刚结束长期内战，我们没有资深记者的指导，开始自行摸索。但是，我们都坚信，战后需要新的眼光和独立声音来刷新全国信息面貌——国家需要新的新闻业，而我们做到了。

《灯塔报》诞生于1998年5月，没有任何启动资金，这也是我们采取网络发行的原因。当时，萨尔瓦多仅有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五的人口能够上网。但是为了生存，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新技术，因为我们当时根本无法承受纸质报纸的运行成本。事实证明，选择互联网真的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决定，当时的我们远远没有想到互联网能对人类命运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

起初，我们只是利用闲暇时间来筹办《灯塔报》。慢慢地，一些渴望在新媒体中锻炼自己的青年才俊也加入进来了。有好几年时间，我们的利润一直都是零，好在我们几乎也没什么支出——大家都是无偿工作，在各自的家中办公。这也培养了我们的独立精神。当新闻业开始重视互联网，读者开始在网络上浏览新闻，这时的我们已经在互联网上稳稳地占领了一席之地。

没有资深记者向我们传授新闻知识，但阅读和大量的自我批评弥补了这一缺憾。《灯塔报》的成熟得益于我们从自己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断反思和探讨我们所做的事情。

得到认可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终于有了工资和真正的办公室。很多从一开始就加入我们的新闻专业的学生，如今已成了《灯塔报》的共同所有人和股东。《灯塔报》创刊近20年，已成为了拉丁美洲最受人们喜爱的高质量报纸之一。

我们的大部分活动集中在调查性报道和叙事报道上，主要有六大方向：暴力与有组织犯罪、腐败、战争罪、文化、贫穷与不平等、政治。我们认为，这些领域是最少得到报道但又最需要报道的，可以解释为何战争结束都20多年了，萨尔瓦多仍是世界上最暴力的国家之一，充斥着不平等和贫穷，并且很大程度上依靠生活在国外的200万萨尔瓦多人（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的现金汇款。

这个职业的矛盾之处就在于，我们的工作做得越好，能留住的朋友越少。我们被指责为叛国者、帮派保护者、私

《灯塔报》和萨尔瓦多摄影师弗雷德·拉莫斯发起了“失踪者最后的外套”活动，发布了一系列照片，供失踪人员家人辨认衣服，从而确认失踪者身份。拉莫斯在法医学院的支持下，从一些无名坟墓中挖掘尸体。



有财产的敌人或革命的敌人。在一个政治两极化的经历过内战的国家，右翼政府指责我们是左翼，左翼政府指责我们是右翼。我们收到来自毒枭、战犯、帮派头目、腐败政客、商人、军队和警察的不友好信息。好几次我们都不得不诉诸法律。

但是，不满信息有时也来自一些失望的读者，他们认为我们的工作不符合国家需要。几年前，我们发表一篇报道，揭露了一些年轻的罪犯遭到警察冷血屠杀一事。很多读者都指责我们妨碍警察的工作，因为黑帮是萨尔瓦多暴力的主要来源。我们非常理解读者为什么有这样的反应，但我们做新闻绝不是为了满足读者愿望或安抚读者焦虑，因为民粹主义新闻是不负责任的、有害的、不道德的。

开放和传承

最近，我们试图将报道扩大到邻国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他们在遭受和我们一样的暴力、腐败和社会衰败问题。虽然我们还没有建立系统性的覆盖体系，但我们的网络建设已初见成效。通过该网络，我们已经可以和邻国的一些记者进行联合调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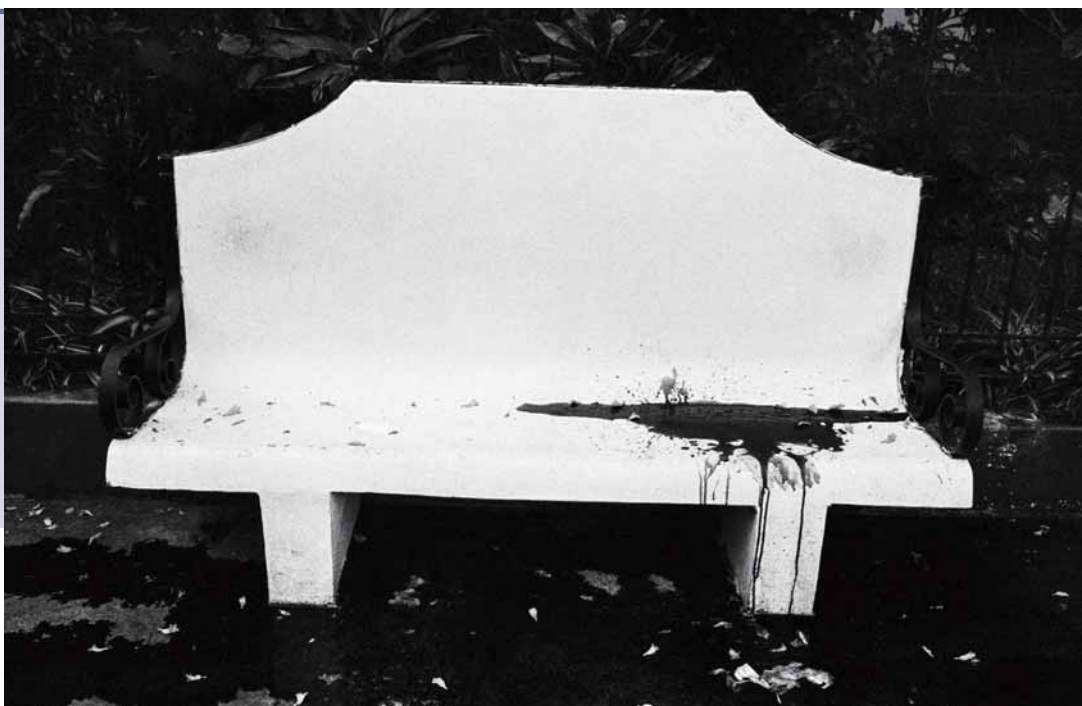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我们《灯塔报》的许多记者也出书、建电台、拍纪录片、办展览、开讲座。我们觉得有必要把我们的知识传承给新一代青年。

为此，我们每年五月都会召开中美洲新闻论坛，举办为期一周的研讨会、讲座和展览，期间将会邀请几十名来自拉丁美洲、美国和欧洲的专家进行发言。研讨会的内容更侧重于调查性新闻、广播新闻、摄影和专栏，并由本地区和其他国家的最优秀记者牵头参加。100 多名记者（主要来自中美洲）参加了今年的论坛。

中美洲新闻论坛是我们长期培训和讲座项目中的旗舰活动，旨在提高中美洲（本大陆最贫困地区）的新闻质量，并使我们的记者和遍布拉丁美洲的同事保持联系，通过这种方式，为建立地区网络，开启新的合作机会做出贡献，从而报道越来越多超越国界的问题。

卡洛斯·达靶 萨尔瓦多记者，1998 年创立了《灯塔报》。他报道的事件覆盖了伊拉克、委内瑞拉、墨西哥、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他的文章在拉丁美洲、美国、波斯尼亚和西班牙发表。2011 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授予了他 María Moors Cabot 奖。

“客观地拍摄一个主题是不可能的，但是可以用事实来展示一个故事，”萨尔瓦多摄影师胡安·卡洛斯说。照片中的主体是萨尔瓦多查丘瓦帕一个公共公园中的一条长凳，凳子上有一条凶手遗留的线索。



© Juan Carlos (www.juancarlospictures.com)

调查性新闻， 风雨无阻

萨尼塔·乔梅格

调查性新闻是民主制度能够良好运作的支柱之一。但如果没有财政自主权，其未来将不能得到保证。Re:Baltica（位于拉脱维亚的一家调查性新闻中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Semih Poroy (Turkey) - Cartooning for Peace

我不喜欢把从事调查性新闻称为责任或使命的驱使。它是因需求产生的个人选择，要拥有一系列技能以及面对辱骂仍然不动摇的性格。我的同事英格·斯布林格曾经解释说，她是因为其祖母才从事这一工作的，因为祖母从不敢用尖锐问题对抗当时的执政当局！

当斯布林格和我就职的《拉脱维亚日报》被它的出版商伯尼尔（瑞典传媒集团）卖给了当地的政治寡头时，我们质问权贵的决心受到了考验。当地寡头们多年来都想让我们报纸闭嘴。这发生在严重经济危机之时，报纸的销售额和读者数下滑，采用网络的方式也为时过晚。

冒险尝试

我们这群曾就职于《拉脱维亚日报》（被认为是波罗的海诸国最好的报纸）的记者们，从未放弃过这样的信念：在一个民主国家，为了约束当局，调查性新闻是非常必要的。而它的监督作用在独裁政权下也是同样的，在专制国

这幅漫画是和平漫画协会的作品之一。和平漫画协会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国际社论漫画家协会。



© James Duncan Davidson (CC BY-NC 2.0)

家，参与报道的记者付出的个人代价甚至更高。离开了调查性的新闻工作，我们将不得不以日常新闻、政府付费内容和名人八卦来维持生计。新闻业将不再是看门狗，而是沦为当权者把玩的宠物狗。

为了给我们的改变做准备，斯布林格在美国待了一年，学习调查性新闻的非营利模式。她回到拉脱维亚创办了 Re:Baltica，即波罗的海调查性新闻中心。该中心由一个记者合作社经营，无偿地向主流媒体提供自己的调查结果。这一创意在欧洲相对较新，但到 2012 年为止，在 50 多个国家已有了 100 多家非营利性性质的调查性新闻中心。

所有人都预言 Re:Baltica 会在一年后死亡，但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在 2017 年 8 月，我们庆祝了我们成立六周年。我们得以幸存并繁荣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因为我们能投入大量的艰苦工作并愿意冒险。在一个相对较贫穷的媒体市场里，国际捐赠是小语种报纸唯一可利用的资金来源，但我们很早就意识到，如果我们的经济收入全靠国际捐赠，那我们就无法持久。在我们的预算中，百分之六十的钱来自补助金，其他的则来自我们的个人收入：教学、咨询、研究和撰写纪录片解说词。我们也接受私人捐赠者和读者的捐赠。我们仍然不确定我们将怎样生存超过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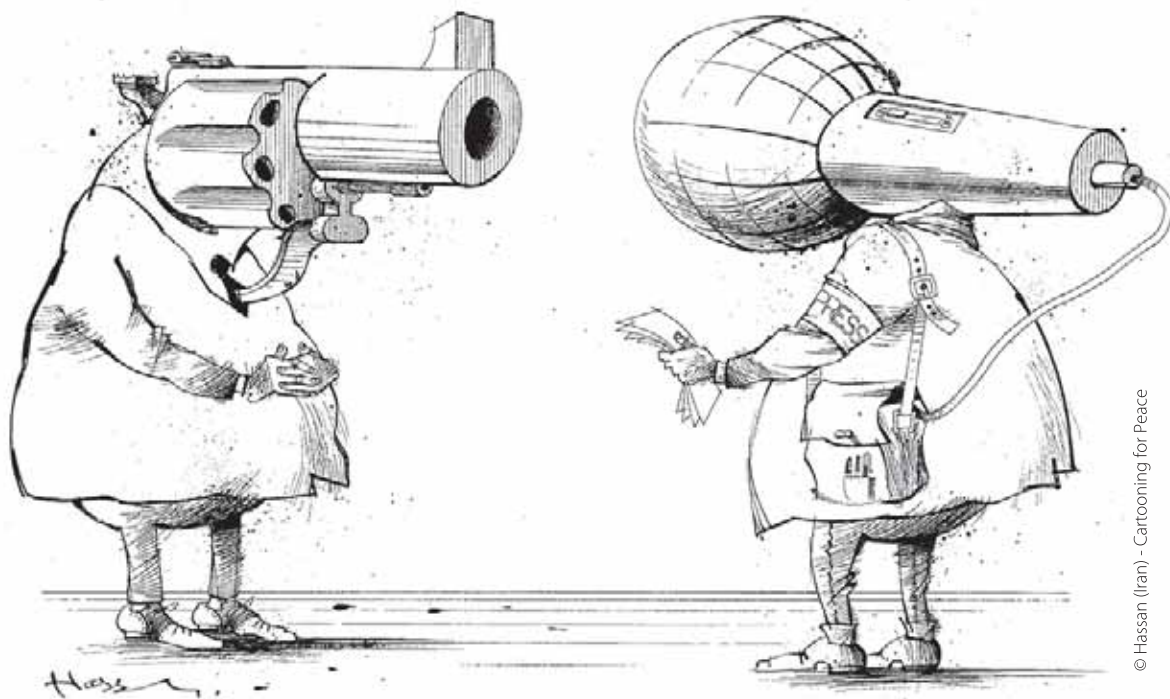
曝光的不止是腐败

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是关键。我们也很节约成本——选择不在网站和办公地点上花太多的钱。Re: Baltica 的工作人员包括两位核心编辑、一位美术编辑和一位会计。然后，我们会根据特定的报道需求雇人，一年能雇用 20 到 30 名记者和翻译。由于我们的工作

加纳调查记者阿拉斯·阿梅雅-阿拉斯，以撰写关于人权侵犯和腐败的报道而闻名。他每次出现在公开场合时，都会掩盖脸部。

免费服务于所有想报道我们调查性新闻的媒体机构，因此我们拥有一批忠诚的合作伙伴。他们来自电视台、广播电台、纸媒和网络，同我们保持着紧密的合作。因为这些媒体之间不存在直接竞争的关系，我们的信息被翻倍地报道，影响也成倍扩大。

调查性新闻不只是揭露腐败。我们还参与了“巴拿马文件”泄密事件的调查——超过 1150 万份金融和法律文件的泄露，曝光了全球的政客、罪犯和流氓行业的名字，还有他们的藏金之地。2016 年，由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牵头，这一惊人的全球事件在全世界范围内占据头条，不仅赢得了普利策奖，还成为一些国家制定新法律的基础。



© Hassan (Iran) - Cartooning for Peace

和平漫画协会

为了庆祝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和平漫画协会（Cartooning for Peace）于2017年5月3日联合举办了15幅新闻漫画在线展览。

2001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前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与法国漫画家普朗图在2006年共同创建了和平漫画协会。旗下来自58个国家的162名社论漫画家，以幽默的形式为尊重文化多样性、人权和各方面的自由而斗争。

突破了语言和文化的壁垒，社论漫画是一种强大的工具，可以用于建立跨文化的对话，还可以在基本问题的辩论中表达观点，诸如言论自由、和平与宽容。



但是我们大部分工作还是聚焦在拉脱维亚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上。从长远来看，不平等是对这个国家最大的威胁。从教育体制的缺陷到大型连锁超市员工的低工资，我们的报道覆盖了一系列社会问题。我们的工作并不总是令人向往的，为了曝光工人们恶劣的工作条件，我的同事曾卧底到水产加工厂。

我们最新的爆料涉及拉脱维亚的一位金融家。他的名字出现在“巴拿马文件”泄密事件中，而且和2017年的法国大选有关系。除此之外，我们也正在波罗的海网上报道一系列揭露假新闻及其来源的文章。

无附加条件

我对调查性新闻的前景并不非常乐观，但是我确信，独裁政权的力量上升会让新闻工作重新变得重要：人们需要区分真相和“替代事实”（也就是谎言），区分真实报道和获取点击量的诱饵新闻。每次当调查性新闻从新闻编辑中消失，非营利性组织就可能成为主流媒体的可行替代品。

这幅漫画是和平漫画协会的作品之一。和平漫画协会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国际社论漫画家协会。

但是当捐赠机构失去兴趣且慈善资金不足时，很多非营利组织就会消失，尤其在最需要调查性报道的国家。调查性新闻必须被当作公益事业并享受资金划拨，但这一希望十分渺茫。

热心培训记者、出资召开会议并开展运动的国际组织，必须制定公开、有竞争力的融资机制，将调查性新闻作为公益事业，进行无条件资助。这是调查性新闻生存的唯一方法。

萨尼塔·乔梅格 拉脱维亚调查性新闻记者，1996年开始在报刊和电视台工作。她是非营利性机构波罗的海调查性新闻中心（Re:Baltica）的执行董事，并在位于里加的新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教授媒体文学。



数字时代的词汇

社交媒体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随之而来的新术语和概念也不断渗透到我们的词汇中。我们简要总结了其中的一些词汇，供读者参考。

算法：这是一个由 algorismus 和 arithmos 构成的组合词（注：算法英文单词为 algorithme）。Algorismus 是一个拉丁词，以 19 世纪波斯数学家花刺子密（Al Khwarizmi）的名字命名，是他将十进制引入了西方社会。Arithmos 是一个希腊词，意思是数字。在现代的数字世界里，一个算法是指可以被计算机自动执行的一系列指令。现在，算法等同于机器智能，与人类智能相对，这一概念被运用在各个领域——从搜索引擎查询到金融市场，再到个性化推荐的选择。

证实偏差：倾向于赞同巩固我们信念的信息，而忽视或低估与我们的信念相抵触的信息。

过滤封闭罩：这个概念是美国互联网活动家埃利·帕雷瑟提出的。他担任媒体网站 Upworthy 的执行总裁，致力于传播“有意义的”资讯。他还是互联网活动平台“全球采取行动组织（Avaaz.org）”的联合创始人。他认为，社交网络算法通过分析用户的“点赞”和“分享”来过滤信息，优先提供与之相对应的个性化内容。这最终会将用户局限在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观点“封闭罩”中。

另类事实：假相和谎言的统称。2017 年 1 月，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



© Polygraphus / Shutterstock

普的顾问凯莉安·康威在解释有关参加特朗普就职典礼的确切人数的争议时，第一次使用了这个词。

虚假新闻：恶意操控的假信息。法国《世界报》事实核查部 Les Décodeurs 认为假新闻“利用传统新闻出版的规范和形式伪装成真正的新闻报道”。

骗局：通过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传播的欺骗性信息。骗局的形式可能是谣言、耸人听闻的新闻或者以虚假条件招揽捐赠。骗局背后的动机可以是政治上的或者经济上的（通常按点击量计提报酬）。如今这个词已经不常用，被“虚假新闻”一词替代了。

后真相：牛津词典 2016 年年度词汇，是一个形容词，定义为“有关或表示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

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情况”。这个词第一次以这个含义被使用似乎是在 1992 年，美籍塞尔维亚剧作家斯蒂吾·特斯初在美国周刊《民族报》上发表了一篇散文用到该词。美国作家拉尔夫·凯斯在他 2004 年出版的《后真相时代：当代生活中的不诚实和欺骗》一书中详细论述了这个词。2016 年，由于英国脱欧和美国总统大选活动，“后真相”一词开始流行，形容以事实作为支撑的政治修辞受到冷落，证明公众对传统媒体和新闻机构失去了信心。

病毒式传播：指或真或假的各种信息通过互联网和社交网络快速传播。信息的病毒式传播依赖于各种基于用户的推荐。这是网络版的“口耳相传”，传播范围无限广。





我的面庞, 我的土地

文字：卡特琳娜·马尔可洛娃

摄影：玛丽安·劳莫尼埃，保罗·劳莫尼埃，贝尼



萨科摩克·卡瑟克的小孩与长辈们一起参与共同创造工作室的活动。

值此世界土著人民国际日（每年的8月9日）之际，发表本图片摄影报道。

IDENTITESproject图片发表授权：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4.0。

五个大陆，五年相遇，跑遍数万公里，最终只得出一个结论：我们都是同样的人类。这是法国摄影师兼视觉艺术家贝尼对自己于2013年发起的IDENTITES游历项目的总结。这次多方面的摄影经历把他带到了世界各地。从河内到拉巴斯，途中经过阿克拉，贝尼用镜头记录各地人的面庞，呈现出一个令人惊叹的肖像摄影作品组。他有感而发：“我们离开本国，探寻不同的事物、不同的人，但最终找到的是我们自己。”

让我们跟随他的脚步，到巴拉圭9号国家公路——Transchaco路上去。这条唯一连接首都亚松森和玻利维亚边界的公路全长800公里。那是在2015年，IDENTITESproject#3正在全力展开，南美洲是贝尼项目第三个阶段的地点，第一次他的旅途不再是孤单一人。劳莫尼埃兄妹——玛丽安和保罗——加入旅程，协助他的记录工作。过去四个月里，他们穿过了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现

正在一辆去往大查科的车上。玛丽安把大查科平原称为“地球上尚存的最偏远地区之一”。大查科是一个横贯阿根廷、巴西和玻利维亚的干旱大平原。玛丽安说得没错，因为她强调：“我们驱车14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他们的目的地是萨科摩克·卡瑟克人的聚居地。土著事物国际工作组的数据显示，萨科摩克·卡瑟克是巴拉圭查科地区531个土著社区之一。社区名称意为“许多小鸚鵡”。萨科摩克·卡瑟克人从19世纪末起就逐渐被逐出祖先的土地。2010年，整个社区只有66户家庭，共268个人。经过将近30年的法律抗争，他们终于在2010年8月24日收到了美洲人权法庭的有利判决。这份判决书命令巴拉圭当局将10700公顷土地归还给萨科摩克·卡瑟克人。虽然国家并不情愿执行，但在判决的支持下，萨科摩克·卡瑟克人从2015年初开始回到自己的土地上。



IDENTITES 项目的一行人赶上了这一事件。玛丽安说：“他们回到这片土地还不到 10 天。”这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伟大时刻，气氛异常热烈。但是回归先祖之路还远远谈不上胜利。玛丽安接着说：“他们的生活条件极差，睡帐篷，以钓鱼为食，喝池塘的死水。”集约化养牛和大豆种植对土地和森林的破坏常常是不可修复的。土著人的身份正在经受严峻考验——他们的信仰、生存模式和文化习俗都和祖先土地紧密相连。

当时，贝尼在巴拉圭组织了项目的旗舰活动——一个共同创造的工作室。毫不意外，他把这片土地作为整个作品展的中心，活动给人们带来了充满情感的独特的心灵分享时光。玛丽安解释说：“村长告诉我们，这个项目对社区成员来说特别重要。虽然他们还在全身心地争取收回自己的土地，但是和我们一起工作能够让他们有机会思考一些其他事情，拥有只属于他们自己的、不一样的团聚时光。”

非政府组织Tierraviva的奥斯卡·阿亚拉在2010年美洲人权法庭上代表萨科摩克·卡瑟克人。据他说，萨科摩克·卡瑟克人已经收回了7901公顷土地，约占他们合法土地的73%。



录像“查科”节选图片，反映了共同创造工作室集体工作的不同阶段：从收集植物和泥土，到晚间的幻灯放映，孩子们将面部的轮廓描在黄麻画布上。



项目链接

半球事物理事会资料显示，巴拉圭属于世界上森林砍伐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2年启动了地方和土著知识系统项目，该项目使全世界关注到土著社区在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萨科摩克·卡瑟克人回归故土，点燃了人们的希望。他们祖传的知识，加上2017年2月宣布的查科政府造林项目，有望使土地得以修复。



Serafin (1)、Nancy (2)、Gustavo (图 3) 和一个小女孩 (图 4) 是贝尼的摄影对象。活动结束后，每个人都在心中留下了另一个自己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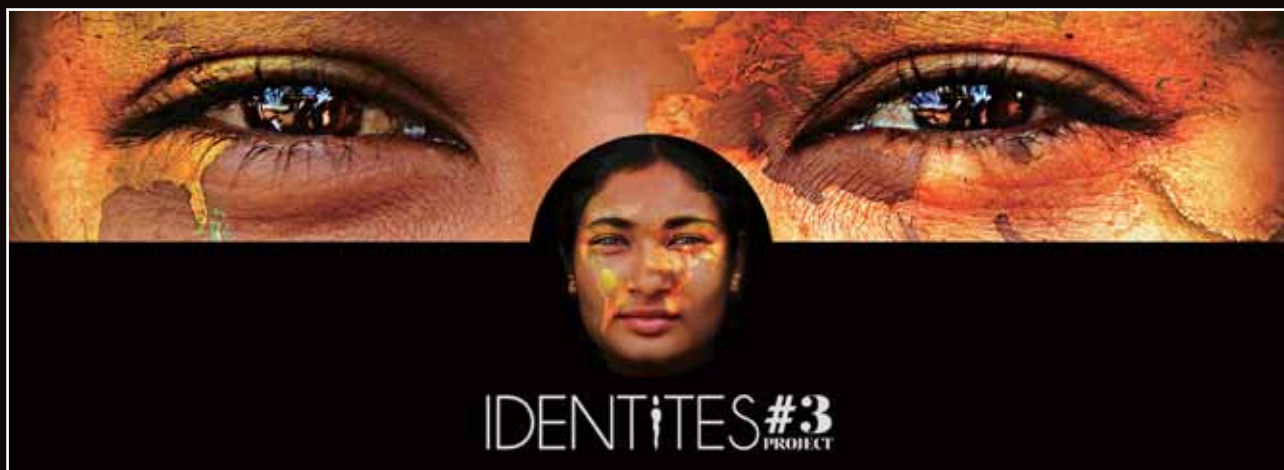


摄影和画像的“融合”，体现了共同创造的概念。





萨科摩克·卡瑟克人保留了工作室的所有画像的原件，以便在有需要的时候使用。



为了传播画面，IDENTITIES 项目从每段旅程中选择了一张人物照片与世界地图相叠加，来象征人种不同，但人性相通的理念。

当我们本期《信使》杂志出版的时候，贝尼正在穿越欧洲——他项目的最后一站。他于 2017 年 8 月在巴黎以一项特别的活动结束本次环球游历：项目团队将尝试和多名法国艺术家合作，创作一个欧洲大面庞。贝尼每次回法国的时候，都会组织 BACKTO 展览，以肖像摄影、共同创造工作室和街头画廊的形式展示项目的各个阶段。临时的街头画廊都布置在公共场所。展览收入和其他公共宣传活动的收入都捐赠给作品中的当地社区，以支持他们的发展。

贝尼想在结束欧洲之旅后放个假，“我想休息一段时间，也许是一年。”但是他已经在构思一本书，通过这本书“汇聚五大洲，让我们，首先是我，消化 2013 年以来所发生的一切”。他还计划拍一部纪录片，并组织一个大型展览，展示整个旅途的见闻。他已经为此取好了名字，也就是他项目本身的基因：同一个世界、同一种人类。

回到巴黎后，贝尼和项目组其他成员一起筹备 BACKTOamerica 展览，回顾 IDENTITIESproject#3 的每个阶段，目的是让公众认识萨科摩克·卡瑟克社区。





“飞行”，作者：塞内加尔艺术家纳德利·罗
© Ndary Lo / Sitor Senghor

人文性，或者说如何满足人类对人文的渴求

阿达玛·萨马赛扣

西方的发展模式把占有文化置于本质文化之前。面对这种模式的失败，人类迫切需要发展另一种以人文为基础的社会发展模式。人文是一个探索人际开放性的概念，还可能是这个幻灭世界的唯一出路。

这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我们的世界正处在一场多方位、无止境的危机之中，状况非常非常糟糕……实际上，这场危机揭示了一种意义的丧失——不断加速的市场全球化使世界文化呈现同质化趋势，导致个人、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彻底丧失了人性。最近的环境、能源、人口和数字化挑战，再加上不平等和贫穷现象，加剧了生存焦虑和对未来缺乏信心的情绪。

今天最普遍的“发展模式”是建立在我称之为“占有”或利润文化基础之上的。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已经暴露无遗，而目前的危机则印证了这一模式的破产。这种以“西方模式”为起源的国际关系特征是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不管是物质财富方面还是知识产品方面。其结果是，我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发展模式，弘扬与本质文化相连的价值观。



© Berette Macaulay

画作“无记忆的记忆”的左半部分，作者：布莱特·麦考利（塞拉利昂和牙买加）。该作品正在牙买加国家美术馆 2017 双年展上展出。

基于以上考虑，几年前，我建议人们探索一个新的概念——“人文性”。这个概念参考了我的精神导师马提尼克诗人艾梅·塞泽尔的“黑人性”概念。

我用“人文性”一词来翻译非洲语言中的一些词语，如班巴拉语中的 maaya，富拉语中的 neddaaku，桑海语中的 boroterey，沃洛夫语中的 nite，班图语中的 ubuntu，以及更多其他语言表述。这么多的词汇都表示“人类品质”这一概念。

为何要重建 CIPSH ?

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 (CIPSH)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一个非政府组织, 1949 年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成立, 旨在重申人文科学在后战争时期的意义和挑战。

这个隶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学术团体曾经有过辉煌的时刻,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该组织已经大不如前。世界人文大会 (WHC) 为 CIPSH 的会员单位提供了一个机会, 鼓励各自学科的代表帮助重建人文科学在世界上的地位, 并对 CIPSH 进行彻底的改革。这将使我们有可能利用世界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 用更丰富的、多中心的方式来取代西方中心论的观点。

幸运的是, CIPSH 的内部和外部重组已经开始。2015 年 12 月, CIPSH 临时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会议投票决定修改章程, 允许包括基金会和团体联盟在内的组织成为会员。CIPSH 的地理范围也拓宽了, 可以建立地区分会。于是, 2016 年 CIPSH 亚太分会在中国成立。最后, CIPSH 会员组织数量大幅增加, 从 2014 年的 12 个增加到 2016 年的 17 个, 还有 2 个新会员正在发展中。

此外, CIPSH 正在设立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文科学教席, 这些教席将参加世界人文大会。

把人与人连起来

非洲社会一直把“本质”而不是“占有”放在发展的中心。从全球范围来看, 一些非欧洲社会的世界观也是把“本质”放在与世界的各种关系的中心, 其特点是永远追求非冲突的、和平的关系,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与他人达成共识, 与环境和谐相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西方社会也秉持同样的世界观, 直到它被一种以市场和物质的原教旨主义以及个人积累论为基础的现代化所主导。

“人文性”是我们对他人的永恒开放, 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要求彼此之间形成一种永久的团结关系, 不互相算计, 即具备一种自发欢迎他人的冲动。这种“人文性”使塞泽尔的美丽词语“把人与人连起来”成为可能; 它也是“本质”文化的基础, 与极权主义的“占有”文化截然不同——“占有”文化会导致以占领甚至统治为目的的永久冲突关系。

2003 年 4 月, 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乌班图研讨会上, 我的良师益友, 来自布基纳法索的约瑟夫·基-泽尔博 (历史学家、政治家和作家, 1922 年—2006 年) 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 他强调说: “那么, 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些事情提上议事日程……全球社会斗争, 乌班图的概念、问题、目标、范例——它将是盲目的市场经济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的人类重商主义的一剂特制解药。”



他演讲中提到的“乌班图”, 即“人治疗人”, 出现在他此后出版的《泛非洲标记》一书中。约瑟夫·基-泽尔博在他的书中继续分析指出: “乌班图将成为这一头等重任的最强有力的工具。但是, 首先, 它应该成为这一任务的目标, 成为和平的意义。这并不意味着要把它发展成人类学的文化主义形式, 而是当我们遭受单轨思维的碾压时, 我们迫切需要解除那些目前依靠结构性暴力来解决问题所带来的冲突。”

我现在确信, 鉴于现有发展模式的失败, 我们不得不考虑设计一种以人文性概念为基础的新的社会发展规划。



人类科学的重大国际会议，首届世界人文大会于2017年8月6日至12日在比利时列日举行，为我们提供了深入了解这一概念的机会。

空前盛事

列日被称为“热情的城市”，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工业上，它都是欧洲中心的一个多元文化城市。在比利时国王的资助下，列日将举办一场史无前例的活动。为何要召开世界人文大会？

我的这个想法最初出现在2009年，我第一次担任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席期间。CIPSH是1949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下成立的非政府组织。

为了人类能重建彼此之间的联系，我们必须通过寻找非冲突型的关系、与环境之间的和谐关系来促进我们与世界的关系。

这个想法是我的三种观察结果的产物。一是伴随着金融全球化下的周期性动荡，2008年—2009年的危机不仅仅是金融或经济问题，它演变成了一场“全面”危机。它是一场社会危机，在某种程度上，它证明了主流的新自由主义和以西方为中心的发展模式的失败，导致了真正的意义消失。

二是全球人文科学的逐渐边缘化。人们怎么能接受这样的现实——这些担负着为我们解释社会变革复杂性的科学已经僵化不再发展？

第三，我观察到，在全球知识创造和合作中，欧洲以外和“西方”以外的学者参与度很低，甚至无人参与或完全无视。更加糟糕的是，传统知识和世界上半数的语言都面临着消失的风险——被称之为“知识谋杀”和“语言谋杀”。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2009年迫切提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世界人文大会。作为该类型会议的首次尝试，其目标是着手恢复人文科学在世界上的地位。

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虑

世界人文大会的中心课题是讨论人文科学在21世纪的作用。21世纪的特点是文化的多元化，不同形式的单轨思维已经失败，需要在日常逻辑中重新引入中长期的考量。这是一个正在遭受全球变化、不断增长的移民、社会和经济压力等问题侵扰的世纪，解决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各种文化间的理解，依赖于对人类多样统一性的理解。此外，同样还依赖于各学科之间的科学关系的强化，以及与艺术和科技关系的强化。



“我们的世界正处在一场多方位的、无止境的危机之中。”阿达玛·萨马赛扣说道。

“虚拟场景——上海地图”，用赌场筹码堆成的上海地形图，由中国艺人刘建华创作。2005年—2008年，在意大利圣吉米尼亚诺常青画廊展出。

这个世纪以全球恐怖主义的不断发展为开端，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哪个国家可以逃脱这种盲目残忍的恐怖袭击，无辜的市民是这种无端的、野蛮的、无法言表的暴力的受害者。一种难以忍受的焦虑弥漫全球，主要是因为这种暴力行为曾经在殖民征服和解放战争中为人所知，但是自从二战以来，除了少数例外，相对而言已少有人提及。

因此，世界人文大会的主要目标是研究人文科学如何在国家、地区和国际层面帮助人们衡量和理解市场全球化带来的文化转型，使他们能够更好地管理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各个方面。

面对我们正在经历的社会和人类危机，以及一个支离破碎的世界——这个世界上非人性化进程正在不断发展壮大，世界人文大会的追求目标是建立一个关于挑战、利害关系和新知识等现代思想之间的多方对话，使人文科学能给这个世界多一点清晰易懂，少一点晦涩难明，少一点对抗，少一点杀戮，同时多一点人性——它是我们共同的希望。

人文科学是对人类语言天赋的一种颂扬，也是对我们社会、政治、经济和艺术实践繁荣发展产生的知识的一种颂扬。

恢复和重建人文科学

世界人文大会的标题是“全球转变下的挑战与责任”，它清楚地指出了这次会议要讨论的主要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处于转变时期的地球环境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人口增长、领土重组、移民流动、能源和环境的约束、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同质化与新身份的建构，以及通常会造成社会分裂的数字化时代的到来。

世界人文大会的三个阶段

首届世界人文大会于 2017 年 8 月 6 日—12 日在比利时列日举行。它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和世界人文大会基金会（由列日省、列日市和列日大学发起）联合主办。

世界人文大会汇集了来自科学、政治、非政府组织、艺术和媒体等领域的全球 1800 多名参与者，包括拉丁美洲社会科学理事会（CLACSO）、非洲联盟非洲语言学院（ACALAN）、阿拉伯社会科学理事会（ACSS）等主要机构都将出席本次会议。

世界人文大会的整体结构为会前准备、会议过程和会后延续之间提供了联动机制。这使我们有可能在世界不同地区宣扬和分享人文科学，尽管各地存在多样性以及各异的融合点。

世界人文大会的会前准备是指一系列预备会议，旨在让各个地区都可以为这次全球大会做出高质量的贡献，表达他们各自的关注点和特异性。这些会议包括在巴西举行的主题为“领土权与人文科学”的南美洲会议（2016 年 10 月 4 日—7 日），在黎巴嫩举行的主题为“重新定位人文科学：理论、方法、知识成果”的阿拉伯地区咨询会（2017 年 5 月 18 日—20 日），在马里举行的主题为“语言、文化、历史和领土”的人文科学非洲区域会议（2017 年 6 月 28 日—7 月 1 日）。

世界人文大会还从一系列影响事件中受益：中国北京“丝绸之路上的科技与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15 年 12 月 10 日—11 日），中国太湖世界文化论坛，中国澳门“丝绸之路上的文明”（2016 年 6 月 7 日—9 日），韩国水原市召开的旨在强调“人文科学的希望”的第四届世界人文科学论坛（2016 年 10 月 27 日—29 日），还有 2017 年 6 月在巴黎召开的欧洲区域会议和在金斯敦召开的加勒比地区会议。

首届世界人文大会期间（2017 年 8 月 6 日—12 日），全体会议围绕六大主题进行，以应对人类地球转型时期所面临的主要挑战。这六个主题是：人类与环境，文化认同、文化多样性和跨文化间交流，边界与移民，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回忆和政治，以及世界转型期的人文科学。

每一个大洲有四到六名嘉宾就每一个主题进行演讲。

世界人文大会将分成 11 个平行分会，将一系列子主题分成 70 个专题进行讨论。两场战略全体会议将听取各区域会议的报告，并讨论人文科学及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的未来。

世界人文大会日程中还包括七场全体会议和一个由部长与政策决定者组成的小组，将汇集超过 400 名发言者。

系列讨论中包括了 CIPSH 在未来将参与其中的两个大型项目——全球人类历史和世界人文科学报告。

世界人文大会的会后延续部分是各大洲组织的区域性和国家性会议，这些会议都是由世界各个地方的政治机构赞助支持的。这使世界人文大会的结论和建议的实施成为可能。重点将放在公共部门的政策研究上，特别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对基础设施和资金投入的需求。

这个三段式的流程使世界人文大会成为了一个高水准、开放包容和高参与度的对话平台。这有助于促进那些思考、寻求和发现世界危机解决方案的人们与负责政策决策的人们之间更大的协同作用。

有一种感觉，流行的发展模式已经失败，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模式已经失败，它似乎是强加给世界人民的一种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之下，重新考虑人文科学在当今社会的作用势在必行。它需要考虑每一种文化的特异性及其内在的固有资源，对它们进行明智的评估，考虑文化间交流、对话、共同发展的可能性。

因此，世界人文大会是恢复和重建人文科学的一个机会，可以产生典范转移，在丰富的文化和语言多样性基础上重塑世界。这个新的典范将用一种真正的、普遍团结的关系来替代原来竞争的冲突关系，这将是过渡时期的人类地球迎接挑战的唯一途径。

总之，我们不得不用生活和献身于“人文性”来满足人类地球对人性的渴求。

阿达玛·萨马赛扣（马里共和国）现任世界人文大会主席。他是前马里国家教育部部长，曾担任世界信息协会世界首脑会议的筹备委员会主席（日内瓦，2002 年—2003 年）。萨马赛扣也是巴马科非洲联盟非洲语言学院（ACALAN）的第一任执行秘书。从 2008 年—2014 年 10 月，他担任了两届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主席，目前他是该理事会的名誉主席。

本土故事的重要性

© Francesco Giusti / Propekt (www.francescogiusti.com)



牙买加金斯顿塔希尔贫民窟一所学校里的壁画——向非洲致敬

约翰·艾雅图德·伊索拉·比瓦基

过分强调诸如科学、数学和技术等实用学科的重要性，忽视人文学科的研究——这一现象正威胁着牙买加和加勒比地区的人们欣赏、讲述本土故事的能力。

自从人类拥有了智慧，就试图全方位理解生命，理解所生活的世界。人类不仅运用语言、文学、哲学、教育、宗教、艺术、历史、人类学、考古学和社会学去解释和记录周围的世界，同时也运用经济学、心理学、媒体学、发展学、体育学、性别学、金融学、市场学、政治学、环境学、传播学、文化学和法律。其中一些学科被归类为社会科学，因为有必要为其建立科学之有效性，但我相信它们也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运用不同的语言，人类创造了自己的故事，他们重视自己的本土故事甚于来自其他地区的故事。

所有的文明都非常重视包含了自身本土文化、知识体系和存在方式的故事。

有三件事极大地影响了人文学科在西方学术界的地位，分别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逻辑主义——一种现代数学思维学派，由德国哲学家和数学家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戈特洛布·弗雷格（1884年—1925年）创立。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相结合产生了逻辑实用主义，并使人们确信，所有对知识的追求都必须使用科学的方法，否则它将失去有效性和相关性。

这种认识对非欧洲社会的知识遗产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这些知识遗产常常被描述成是原始的、不文明的、异教徒的和落后的。它为对非欧洲社会进行殖民化以及对非洲人民实行奴役提供了理由，从而得以在经济上大量占用当地的各种资源。

当一个故事驱逐另一个故事

最糟糕的认知是把欧洲（和阿拉伯）的故事当成普遍真理，导致全球范围的本土社会故事被排挤和取代。非洲人对自己的祖先知之甚少就是一个现实例证。他们使用别人的姓名、语言、宗教、科学和技术，忘记了——有时甚至是痛恨——自己本土的知识体系、生活方式、价值观和民族精神，从而迷失在别人的世界里。



牙买加跨学科艺术家科兹莫·怀特，
探寻身份的概念

这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首先，工业化导致了各种形式的全球化。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但是它没有阻止加勒比地区的人们用他们自己的非洲文化遗产去理解文明，找到通向文明之路。我们没有必要去对抗全球化，相反，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祖先的历史文化来丰富全球化的内容。

其次，对 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的提倡，形成了一种扭曲的认识：其他没有给社会带来明显而直接的实际利益的学科是毫无价值的。在牙买加和西印度群岛地区，从小学、中学到高等教育，教育的重点都放在科学、技术和社会科学上。诸如美术、音乐、伦理、历史、文化和遗产等学科在各个层次的教育中都被缩减到最少，

甚至被直接删除，因为人们认为这些学科对社会发展没有贡献。

在西印度群岛大学（UWI），因为重视自然科学而低估人文学科对国家和地区发展的贡献，使得一直以来人文和教育学院的学生人数占学生总数的四分之一都不到。牙买加报纸《拾穗者》发表社论建议政府减少对历史、语言、哲学和艺术等学科的投入，集中力量在能促使牙买加追赶世界一流技术的学科上。该报错误地认为，你并不需要认识你自己、你的现状、你的社会或者你的祖先，一旦你达到了西方的技术水平，一切都会变好。

第三个问题涉及国家、地区和个人层面金融财富的减少。教育，特别是人文学科教育，在社会进行结构化调整时，很容易遭遇投资下滑。家庭和个人会倾向于投资那些“有市场前景、有生产力、有助于提升履历”的学科。很多国家也是如此，认为应该把重点放在科学、工程、医学和技术教育上，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学科会带来更高的产能。

身份和遗产

人文学科研究对一个社会的身份认同、塑造和投射至关重要。当一个社会忽视对人文学科的理解、欣赏和传播，那么各种形式的陋习会随之涌现：历史传承减少，社会本质遭到侵蚀。知识谋杀——消灭本土知识体系，或毁灭现有知识——是加在非洲人民身上的知识刑罚，它剥夺了非洲人民的身份和遗产，使其变成新世界中一个困惑、迷失和错位的民族。

牙买加社会中猖獗的暴力和不文明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即使在各行各业中的表现都超乎预期，但这个社会仍然偏爱欧洲的、西方的事物。

牙买加作家、教育家埃罗尔·米勒说，西印度群岛大学的思潮是历史的产物——在废除奴隶制，获得解放后，牙买加对区域经济的依赖性使牙买加无法追求注重人文学科的全面教育模式，只能采用仅顾眼前利益的教育模式。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致力于建设一个更加人道的世界，一个重视理性、反思和多样性的世界。但是，加勒比地区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惨无人道的跨大西洋奴隶制，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这些国家的卑微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他们没有能力做出能使他们的人民摆脱贫困的决定。



© Francesco Giusti / Prospekt (www.francescogiusti.com)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牙买加是全球杀人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尽管它是马库斯·莫西亚·加维（牙买加政治领袖、记者、编辑、泛非洲主义运动先驱）和尤塞恩·博尔特（奥运会短跑冠军）的出生地，以及瑞格舞（一种源自牙买加的全球流行音乐）的发源地。

教师培训是关键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牙买加和加勒比地区的人文学科教育状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应该在牙买加和加勒比地区强化及推广教师培训及教育项目，西印度群岛大学应该发挥带头



牙买加金斯顿塔希尔壁画前的年轻人

作用，对自己在人文学科教育中的角色进行自我反省。

西印度群岛大学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哲学研究系或者哲学研究学院，这将有助于在大量其他学科研究中引入批判性思维，包括商业、旅游、冲突解决和环境等。

和平的基石植根在人们的思想中，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在小学、中学和高等教育中进行人文学科教育。牙买加的文化和音乐流派已经越过牙买加海岸，在世界范围产生着影响，但是这些传统文化却很少在牙买加的年轻人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这些知识原本可以被用于影响牙买加人的创造力，赋予他们经济能力。

最后，人们必须明白，人文学科是一切知识生产过程的基础，包括知识的管理、保存、收集、传播和应用。富裕强大的国家不会把公民的教育留给其他国家。同样，贫穷落后的国家也必须重视维护自己的本土故事，并将其以有益身心的方式传递给社会，为我们共同的却又美丽多样的人类做贡献。

约翰·艾雅图德·伊索拉·比瓦基（出生于尼日利亚的牙买加人）多本著作的作者，其中包括《土著约鲁巴社会的法治和治理——非洲哲学随笔》。他也曾负责多本刊物，包括《加勒比哲学杂志》。

城邦核心的诗人

塔尼拉·波妮

像所有的艺术创作形式一样，诗歌是人文的支柱之一。它藉由情感、灵感和想象传递出知识和人文价值，甚至于说，它塑造着人类的身体和灵魂。

艺术不需要推理。它属于情感、灵感和想象范畴。艺术体验经不起论证、核查和证明，因为它不是科学知识。艺术通过自己的途径，而不是惯常的科学路径，在个体的塑造中扮演着主要的角色。它传递人文价值和世俗知识，这些知识和价值观对我们向别人敞开心灵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艺术创作是连接人类之间的牢固纽带，超越语言、信仰和文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艺术可以被看作是人文支柱之一。

人文时光

Humanities 一词在英语国家很常见，其含义涵盖了文学、语言、哲学、历史和艺术学科，这些学科重点关注思想的开放性和人类社会生活。

在很多法语国家，除了学术界某些领域，这个词已经很少或根本不再被提及。然而，在以前的法国教育体系中，却有“习人文”一说。它指的是：学习“它的”古典作品；研究古代语言；阅读荷马、维吉尔和其他古典作家的作品；通过探讨存在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其他文明的语言，从而获得广阔的视野。

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如非洲文化中，也有与此相当的说法，即学习“我们的”古典作品。这是一个启蒙的过程，女孩和男孩将由此接受古代传承下来的文化遗产，从而得以适应现代生活。这就是人文时光。

每个时代、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的经典作品、必读文章。其中，诗歌一直占据着头等重要的地位。一直都是，除了现在——在这个幻想破灭的时代，我们趋向于忘记诗歌的存在。正因如此，我想详细阐述一下这个问题，证明诗歌是人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诗歌何所能

没有一个社会是没有诗歌的。即使创作的过程是孤独的，但诗人们并非是与世隔绝的。他们不是封闭在象牙塔里的隐士，他们创造出一个独特的宇宙，并邀人共享。不管他们的诗歌是书面的还是吟唱的，他们都起到了非常关键的教育作用。

古希腊哲学家们就指出了这点。在他们看来，诗歌是一种学习体验的具体体现，是超越专业的科学或政治学习的通用文化。



他们知道学习荷马和其他诗人对塑造年轻的希腊公民（不包括奴隶及居住在雅典的外邦人）的思想是多么重要。因此，对于荷马诗歌中对诸神形象的负面描绘，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一书中表达了忧虑之情，并认为应将诗人们逐出理想国！

毫无疑问，柏拉图对诗人的指责在于“什么是诗歌”，更在于“什么不是诗歌”。

但是，不管当时还是今日，谁能定义“什么是诗歌”？对于阿根廷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来说，诗歌是“通过巧妙编织文字来表达美”，这样的诗歌定义出现在词典中也许已经不错，但实际上未免太“苍白无力”



© Ernest Pignon-Ernest, courtesy of Galerie Lelong & Co

了。“这些现实在我们的内心深处，”他补充说，“只有通过人类共有的符号才能表达出来。”

感性分享

诗歌创作是为了感性分享。这是它塑造人类、身体和心灵的方式。藉由情感、灵感、想象之路，它充当着传递人类知识和善恶价值观、历史、人类功绩、古老传统及联系自然的工具。

诗歌不仅通过文字和语言创造美来唤醒感觉，也是想象力和记忆力的培养。它是身体和全部感官的表演，因为诗歌的形式（说和写）与诗歌的含义或“信息”一样重要。

法国诗人和哲学家保罗·瓦莱力（1871年—1945年）在《自我语言》中说：“诗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传递思想，而是使他人产生一种类似（但不同）于自己的情感状态。思想（对于诗人和别人来说）只起部分作用。”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1913年—1960年）在他的演讲稿“艺术家和他的时光”（瑞典乌普萨拉市，1957年12月14日）中指出：面对无法理解的现实世界，诗人感觉自己是被“嵌入”的，所以不停地进行“危险创作”。通过危险创作，拯救自己受到各方面威胁的生命，或表达自己存在此世的欢乐——诗人重新在城邦核心获得地位。

穆罕默德·达尔维什（1941年—2008年）的肖像。2009年，法国视觉艺术家欧内斯特·皮尼翁-欧内斯特将巴勒斯坦诗人达尔维什的形象画在了拉马拉故居的墙上。法国作家安德列·维尔特认为：“他的格言警句将永远引起我们的共鸣，激励并鼓舞着我们，使我们保持警惕。”

塔尼拉·波妮 科特迪瓦诗人、小说家、哲学家和青少年书籍作者。她是阿比让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大学的讲师，也是国际哲学学会联盟副主席。她还是科学、艺术、非洲文化和非洲侨民文化科学院院士。



意大利兰佩杜萨市前市长朱塞佩纳·尼古利尼

© Rocco Rorandelli (terraproject.net)



朱塞佩纳·尼古利尼： 好客是岛屿的天性

玛丽娜·福迪 担任采访

作为意大利西西里岛南部小岛兰佩杜萨市市长（2012年5月—2017年6月），朱塞佩纳·尼古利尼勇敢地应对近几年来地中海盆地最跌宕起伏的危机之一：成千上万逃离冲突和贫困的移民。她讲述了这个意大利小岛上6500名居民团结一致，尊重人的尊严，积极面对这次人道主义灾难。本文是对这位被意大利人称为“狮子”的朱塞佩纳·尼古利尼的采访。

2017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您“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和平奖”时，您说接受该奖“以悼念地中海人口贩卖中的无数受害者”，您的意思是什么？

我认为把这个奖项献给在穿越地中海时丧生的移民是诚实和公正的，其实我们在地中海盆地看到的人类悲剧是一场无声的战争。他们的旅途并非自愿，而是被战争和贫困所迫，被我们的政治所迫，然后被有组织的、从他们的困境中获利的罪行所迫。因为在紧闭的大门前，非法人贩给了这些绝望者唯一可能的出路。

目前，新墙开始建立，和北非不同国家的新协议也签订了，唯一目的是维护欧洲边界，而不是保护那些想要到达我们海岸的人们的生命。然而，这个奖项告诉我们存在一个团结的欧洲，人类价值观和好客并没有丧失。

但是，面对移民涌入，很多人称其为“入侵”……

正如我之前所说，好客是岛屿的天性。实际上这也是希腊莱斯博斯岛所做的。这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逃难之路通过兰佩杜萨。说实话，正是因为我们岛屿处在半途中，才使得这条路线成为可能。

我不知道，如果在这里，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在如此之多的人逃难的时刻，换成别人会怎么做。那些主张“赶他们回去”的，只不过是远在他方、不懂海洋法的人——赶回去是不可能的。亲身体验这里的情况有助于理解并唤醒我们的责任感。在这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些场景：精疲力竭、寒冷、赤脚、惊恐不已。我们看到有孩子、有孕妇。人们顿时可以明白他们此行是因为别无选择。无论如何，鉴于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使命，这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我们应当欢迎接纳他们。

在兰佩杜萨，我们经历了一些非常痛苦的时刻。面对诸如2013年10月3日有386人遇难的沉船悲剧，我们可以责怪谁？责怪亡人？那种时刻，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谁是受害者，什么是不公正的死亡。

那不是兰佩杜萨第一次经历艰难时刻……

对，其实在2011年突尼斯事件迫使许多人逃离家园时，我们就经历过非常痛苦的时刻。当时的意大利外交部长罗伯特·马洛尼决定让所有移民留在兰佩杜萨，他对我们说：这些人不能进入意大利。因此要把他们从兰佩杜萨直接遣返，但遣返程序需要时间。可是在两个月内有25000人到达这里，是本地居民的四倍！

岛上居民是怎样反应的？

我们的收容能力超限了。移民的生活条件是非人的，露宿街头，饥寒交迫。但那是一个虚假的紧急情况，25000人跟我们今天看到的人数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如果移民们被分散到意大利各地，他们的人数仍然是可控的。相反，把他们都留在兰佩杜萨造成了危机。

那年，岛上损失惨重。兰佩杜萨岛赖以生存的旅游业崩溃了。但是，即便在那样的条件下，大家团结起来了。兰佩杜萨人尽力帮助移民，给他们分毛毯，分食物。当地居民接替了国家的工作。如果有任何抗议，抗议的是意大利政府，而不是突尼斯人。



© Federica Mameli / SOS Méditerranée

每当有严重经济危机时，太容易把移民指定为共同敌人了。这也是为逃避政治责任的转移，转移那些支持不公平发展模式的人的政治责任。在全球化背景下，这一模式变得更为复杂。历史告诉我们，指责外部敌人有助于加强国内的政治权威，但肯定不能推动公民意识和社区归属感的成长。

今天，非政府组织被指责扮演了吸引移民的角色……

确实，这也是法国非政府组织“地中海救援”面临的情况。我很荣幸和该组织分享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和平奖。但是指责这些组织的人忘了，这些非政府组织之所以来到当地，是为了填补一个空白。

2013年10月3日悲剧后，我们见证了其他悲剧，其中有些更加残酷。如在2015年4月，单单一次沉船事件就有500到700人遇难。2013年一些欧洲领导人来了，显然他们很受震

动。当时的意大利总理恩里克·莱塔在儿童们的白色棺木前跪了下来。意大利政府发起了 Mare Nostrum 行动，这是首次官方人道主义行动，向我们国家致敬。这项行动持续了一年，成本很高，意大利向欧洲合作伙伴寻求帮助。

但是也有反对意见。人们指责 Mare Nostrum 行动完全和今天非政府组织所犯的错误一样，变成了吸引移民的因素，甚至是人口贩卖的同谋。继这个人道主义行动后还有其他行动，诸如 Frontex 行动和 Triton 行动，但是这些行动更多关注的是安全和侦察、打击犯罪。

然后，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所有的行动都停止了，包括多个欧洲国家参与其中的 Frontex 行动，又只剩下意大利孤单一国，只有意大利海军和海岸警卫队舰艇。我们又重新回到 Mare Nostrum 行动之前的样子。随着死亡人数的增加，非政府组织的行动填补了政府空白。

“地中海救援”组织的救援行动。“地中海救援”组织和朱塞佩纳·尼古利尼共同获得教科文组织颁发的2017年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和平奖。

您除了积极参与民间社会活动，还是个坚定的生态学者，反对包括房地产投机在内的一些活动。是什么促使您在如此困难时期决定竞选市长的？

这些斗争引发了由民间力量组成的民主运动，我是在这个背景下参与竞选的，主张阻止我们小岛正在经历的环境恶化和社会退步。兰佩杜萨岛在地理上和社会上都被边缘化了，学校衰落，年轻人别无选择，被迫离开。

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仍然有许多工作要做，但这些岛屿群学会了重新生活。我们投资公共交通、垃圾回收、太阳能和学校。以前，我们只有一所科学高中，今天我们还有了一所旅馆和旅游业专科学校。



15 个月救了 19000 人

“地中海救援”组织的共同创始人和副主席索菲·博在获得费利克斯·乌弗埃·博瓦尼和平奖时说：“我们很高兴和朱塞佩纳·尼古利尼分享这个奖项。2015 年，我们在兰佩杜萨相见并建立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当跟她说到由欧洲人租用民用船进行救援时，她对克劳斯·沃格尔说：‘你们疯了，但我支持你们。’”

博表示：“我们无法眼见成千上万的人死在海上——就在我们眼皮底下、在欧洲的门口——却袖手旁观。”基于这个想法，德国商船船长克劳斯·沃格尔和人道主义项目专家索菲·博于 2015 年 5 月创立了“地中海救援”。它属于一个进行欧洲远洋救援的非政府组织。

该组织的行动范围是地中海——成千上万的移民和难民为了逃离战争和饥荒，冒着生命危险试图渡过这片海域，以期到达欧洲海岸。在过去 15 年中，至少有 46000 人在此被大海夺去生命。

“地中海救援”组织基于航海人员互助的传统价值观而创立，他们与意大利当局罗马海事救援协调中心紧密合作。

该项目的精神支柱当然是“水瓶宫”船。它长 77 米，有 11 名船员，再加上“无国界医生”人员和“地中海救援”人员，一共有 30 多个人，一次可以救援 500 个人，有时更多。

过去 15 个月（2016 年 2 月—2017 年 5 月）在利比亚海岸的救援活动中，“地中海救援”组织救了 19000 多人。幸存者多数来自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尤其是西非和非洲之角，但也有的来自孟加拉国、叙利亚、利比亚、巴基斯坦和巴勒斯坦。

我坚信，诸如我们兰佩杜萨这样岛屿的未来和地中海地缘政治命运紧密相连，我们希望地中海能转化成政治文化交流中心。但实现此目标之前，我们要制止将这些岛屿当作移民监狱，兰佩杜萨险些成了这样的监狱。

我们应该用最纯粹的方式发扬好客的传统，把岛屿作为移民的登陆点和急救地，然后把他们转移到第二节接纳中心，不再把难民当成紧急情况来处理。这样，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移民和旅游业可以共存，岛屿可以繁荣。

我真诚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我和“地中海救援”的这个奖项能鼓励其他举措。我们的例子显示了小领土的大力量。

朱塞佩纳·尼古利尼（意大利）出生于兰佩杜萨岛，由于其勇气和仁慈深受人们爱戴。1997 年，这位激进的生态学者成功使当局把“兔子沙滩”列为自然保护区。2012 年 5 月—2017 年 6 月，她担任兰佩杜萨岛市长，竭力动员意大利和欧洲当局应对移民危机。2016 年，她被授予由作家朱莉·克丽丝蒂瓦设立的西蒙娜·德·波伏瓦妇女自由奖，以表彰她的不懈努力。

名为 Askavusa 的团体，2009 年 3 月成立于兰佩杜萨，创建了 Porto M 空间，长期展出在移民者的船上找到的日常用品。



© Camille Millerand / Divergence (www.camillemlerand.com)



时事



和平漫画协会成员意大利艺术家纳迪的作品，和平漫画协会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持，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国际新闻漫画家协会。

达维特·艾萨克，一个必须被释放的新闻自由象征

娜塔莉·罗斯柴尔德

达维特·艾萨克已经成为新闻自由斗争的国际象征。他被授予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吉列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他的家人说，这个荣誉重新唤醒了人们寄予他尽早获得自由的希望。



© Kalle Ahlsen

达维特·艾萨克的照片，拍摄于1987年—1988年，当时他刚到瑞典不久。

至今，记者、剧作家和作家，达维特·艾萨克，已经在他的祖国厄立特里亚国被监禁了将近16年，期间未经任何审判。艾萨克曾被授予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吉列尔莫·卡诺世界新闻自由奖，他的名字在瑞典家喻户晓（艾萨克是瑞典公民，他的三个孩子和其他家庭成员目前都居住在瑞典）。他那张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肖像照已经成为了国际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斗争的象征。国际特赦组织认定艾萨克为政治犯，并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他。

多年以来，瑞典五届政府的外交行动、国际游说活动、民间团体的努力和社会名流的推动使得艾萨克事件一直处于公众关注之中。但是，厄立特里亚政权既没有理会要求释放他的呼声，也没有给予他公正的审判或让他与外界进行任何接触，他们只在2005年短暂从监狱释放过艾萨克。

艾萨克出生于1964年10月27日。厄立特里亚30年独立战争的早期（1961年9月—1991年3月），他在阿斯马拉长大。他的父母开了一家意大利小熟食店，艾萨克是家中五个孩子中的一个。

在艾萨克二十几岁时，厄立特里亚人民解放阵线和埃塞俄比亚军队之间的战斗愈加激烈，苏联放弃了对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支持。1987年，艾萨克逃往瑞典，在那里，他早期以做清洁工为生。

致力于民主政治

他的弟弟伊赛亚斯·艾萨克称，艾萨克一直致力于为自由和民主的厄立特里亚而战。伊赛亚斯说：“达维特比我大10岁，因此我童年时对他的记忆很少。我十几岁时，他是我在瑞典的提格里尼



© Presidential Palace Press Bureau

亚语老师。他曾反复跟我说：‘不要忘记你的语言，你的国家，你的根。’文化和身份对他来说很重要。同时，他尊重瑞典社会，并努力适应这里的生活。”

1993 年，成为瑞典公民后第二年，艾萨克回到了新独立的厄立特里亚，并在这里结婚生子，有了一对双胞胎雅琅和伯乐恒，以及一个小四岁的女儿戴娜特。

“我对父亲最早的记忆之一是他教我们兄妹阅读，从我四岁起就教我们数学，” 现年 23 岁的伯乐恒·艾萨克说，“尽管有时他不太会教，他很希望我们了解我们的历史和周围的世界。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是一位非常尽职的父亲。”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厄立特里亚社会自由化的努力似乎得到了回报。国家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允许私人创办平面媒体。艾萨克利用这个开放机会，联合成立厄立特里亚第一家独立的报纸《塞迪特河报》。《塞迪特河报》的名称借用了厄立特里亚境内唯一一条全年不断流的河流的名字。

信息自由传播

“我们希望我们的报纸像不断流的河流一样源远流长。”《塞迪特河报》的另一位创始人亚伦·贝尔哈内解释说。

艾萨克为《塞迪特河报》的合伙人。他还是一个多产的专栏作家，专栏内容覆盖文化和地方事务。但是不久，厄立特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爆发了新的冲突，艾萨克被迫离开厄立特里亚前往瑞典。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很快到瑞典和他团聚。2001 年，尽管厄立特里亚的政治局势依旧动荡，艾萨克还是决定回家。由于《塞迪特河报》发表了一封致厄立特里亚总统的公开信，艾萨克一下子陷入一场危险的争议之中。几个月以后，所有的独立报纸被禁止发行。公开信的 11 位签名者（其中包括一些高层政界人士）和包括艾萨克在内的 10 名新闻记者被监禁。

逮捕行动正好发生在美国“9·11”事件几个星期后。“世界从此彻底改变，他（达维特）错过了太多的东西，”伊赛亚斯说，“有时候我觉得他几乎被世

2017 年 5 月，达维特的女儿伯乐恒·艾萨克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庆祝会上。

界遗忘了，解救他的努力也一蹶不振。但有时候我又充满信心。”

他补充说：“现在，我哥哥被授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新闻自由奖，他的事件也因此引起了联合国层面的关注，我又充满希望。”

“我相信，这个奖项对达维特·艾萨克的遭遇传递了一个重大信号。”瑞典广播电台总干事兼首席执行官、2017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新闻自由奖评委会主席西拉·本科表示。他强调说：“没有联系他身边任何人或家人，没有审判，他就直接被监禁了。这种情况完全无法让人接受。”

希望再生

2017 年 5 月 3 日世界新闻自由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新闻自由奖颁奖仪式在印尼雅加达举行。就在此前几天，非洲人权委员会宣布介入艾萨克案件。该委员会是在收到艾萨克的律师团



© Henry Gylander

基于人身保护法原则递交的一份请愿书以后做出以上决定的。人身保护法原则是一项法庭命令，要求对他人实施监禁羁押的个体或政府给出监禁羁押的正当理由。尽管厄立特里亚当局接受这一原则，但他们却一直拒绝对艾萨克和其他自 2001 年 9 月以来被监禁记者的审判权。

非洲人权委员表示将对厄立特里亚政府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的问题进行询问，这一决定让艾萨克家人希望再生。但是伯乐恒只敢谨慎乐观，她说：“这有一定的意义，但是这是否会有效果仍然取决于厄立特里亚政府。我父亲的命运由他们掌控着。”

伊赛亚斯称这一决定是个“积极现象”。“这一决定确实向国际社会和厄立特里亚发出了一个信号。厄立特里亚对我哥哥实施了严重人身侵害，持续达 16 年之久。我只希望当权者能倾听呼声，并有所反应。”

温和外交

伊赛亚斯说：“瑞典的官员、媒体和民间团体也是过了好一阵才开始关注我哥哥的事件。”最终，当时的瑞典政府运用“温和外交”策略跟厄立特里亚政府进行交涉释放艾萨克。2005 年 11 月，艾萨克获得短暂自由，但是这短暂的希望之光很快被熄灭。两天后

2016 年，“释放达维特”支援委员会发起了“和达维特共度一点时光”行动。很多地方都放置了关押达维特的单人牢房的实体模型，请公众在其中单独呆一刻钟，用 15 分钟的时间来体验 15 年的监禁。该照片拍摄于达维特被监禁的第 5000 日，地点是斯德哥尔摩的一个主要街区。

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又被逮捕了。几年后希望之光重新点燃。一名从厄立特里亚逃出的前监狱看守告诉瑞典媒体，艾萨克仍然活着，但是身体状况很差，羁押他的环境惨无人道。人们认为在过去的 16 年里，艾萨克大部分时间都被单独监禁，被独自关押在黑暗的小牢房里。

本科说：“艾萨克的遭遇表明，我们需要新闻记者问责当权者。但不幸的是，这样做让记者面临越来越大的风险。”

他补充说：“我们应该对有人愿意冒着风险为我们提供我们本来无法企及的现实报道而感激。达维特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全世界有很多这样的新闻记者，是他们为捍卫言论自由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我很自豪，我主持的评审委员会一致决定授予达维特·艾萨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新闻自由奖。这个奖项将会让监禁他的人压力剧增。”



© Britt Stakston

娜塔莉·罗斯柴尔德（瑞典）Sveriges Radio——瑞典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制片人和记者，同时也是一名自由撰稿记者。她的文章发表在多种国际刊物上，包括《华尔街日报》《大西洋月刊》《卫报》和《外交政策》。

重建文化遗址， 态度转变

克里斯蒂娜·卡梅伦

自然灾害和越来越多的恐怖袭击让世界文化遗产遭受到比以往更严重的损坏。尽管有固有的反对意见，世界遗产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因此对重修被破坏或摧毁的遗址的态度变得更为积极。

值第41届世界遗产大会于2017年7月在波兰克拉科夫举办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发表本文。



© OUR PLACE World Heritage Collection (www.ourplaceworldheritage.com)

文化遗产正在遭受规模空前的全球性毁灭，是否重建重大遗址，从而恢复它们的历史意义，已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议题。

2001年阿富汗巴米扬峡谷古佛像的毁坏，预示了全世界范围内蓄意亵渎标志性文化遗产的风潮，这包括叙利亚的帕尔米拉古城和阿勒颇古城遗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这些对世界遗产地的

攻击行为称作文化清洗，需要出台国家和国际新政策应对，也需要联合国、国际刑警组织和国际刑事法庭的介入。

此外，自然灾害也正在破坏大片的古迹建筑。对此，我们在2015年尼泊尔加德满都峡谷的地震中有目共睹，其中，该世界遗产地内成百上千处建筑受到影响。



日本广岛和平纪念碑，1945年8月6日受到原子弹袭击后，一直以破损的状态示人。

重建并不是新事物，它的根源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的西方文化。当时，由于社会的快速工业化以及随之导致的历史断层，进而产生了历史遗迹概念和对历史的意识觉醒。建筑师们为了让历史遗迹重现辉煌，试图对建筑遗失的部分进行重建。法国哥特式复兴建筑师和理论家尤金娜·伊曼纽尔·维欧利特·勒托克重建法国卡尔卡松城堡的工事防御墙就是一个典型事例。在 20 世纪，这股潮流在北美洲尤为强劲，历史复制品成为“活着的历史博物馆”，深受游客喜爱，而且还对历史做出了生动呈现和诠释。最著名的例子是美国弗吉尼亚州殖民地威廉斯堡。在那里，350 座建筑于 20 世纪 30 年代在废墟上重建，而其他更新的建筑却被拆除，建立了一个再现 18 世纪殖民地美国的公园。

我们甚至可以说 1972 年《世界遗产公约》起源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埃及包括阿布辛拜勒神庙至菲莱岛的努比亚遗址的拆迁和重建项目。这片杰出的考古地区拥有 3000 年历史的神庙和纪念碑遗址，因修建阿斯旺水坝而被淹没于茫茫大水之中。这些历史珍品得以保存归功于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空前的、长达 20 年（1960 年—1980 年）的努比亚遗址国际保护运动。

诚实和透明

问题仍然是：重建还是不重建。文物保护专家一贯以来不赞成重建，因为重建会篡改历史，虚构出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虚幻空间。这种反对意见形成于

19 世纪，而法国艺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阿道夫·拿破仑·迪伦把它推向了高潮。阿道夫反复强调的指导原则是“对于古遗址，重建不如修复，修复不如修补，修补不如加固”。

1883 年，在《首份修复宪章》里，意大利建筑师卡米洛·博托提出了文物保护八原则，他强调在增补古建筑遗失部分时需要诚实与透明。这些想法最终都体现在 20 世纪的重要学说文本上，而这些文本是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所依据的根基。1964 年，《保护和恢复古迹和遗址国际宪章》，即《威尼斯宪章》，明令禁止重建，而且一旦出现臆测，那么修复必须马上停止。随后制定的标准和指导方针也与宪章保持一致，表达了对历史遗址进行重建的谨慎态度。但也有例外，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澳大利亚委员会《关于保护具有文化意义遗址宪章》，又叫《巴拉宪章》，制定于 1979 年，它则接受重建，条件是这种重建在使用模式和实践上能够保留文化价值。但是即便如此，它也主张“改变任何一个地方都必须谨慎”。

态度转变

在早些时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遵循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学说，通常反对重建。但是在 1980 年，委员会为历史名城华沙破过例，华沙城的大规模重建被视为波兰人民爱国心的表现。直到最近，委员会很大程度上还是不提倡重建，当然也有其他一些例外。例如，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莫斯塔老桥地区于

2005 年基于复原文化价值（该遗产的非物质层面）理念而允许重建。又如：位于乌干达卡苏比的布干达国王王陵在 2010 年毁于火灾。委员会初步允许重建，但条件是重建必须基于完整的历史记载、传统的形式和技术及可持续的用途。的确，现行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制定的《实施世界遗产公约操作指南》依然重申《威尼斯宪章》强调的“考虑到纯真性，考古遗址或历史建筑及街区重建只有在极个别情况才会认可。只有依据完整且详细的记载、无任何臆测而进行的重建，才可以接受”。

但是，鉴于近期极端主义者对遗产地的破坏，世界遗产委员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的决定对重建的态度表现出转变。这种转变部分反映了《奈良关于纯真性问题文件》的观点（该观点于 1994 年在《威尼斯宪章》中就有设想，并已被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采纳）。该文件中，非物质属性的广泛利用观点给了重建一个更有力的理由。

对重建态度的改变可以说是始于 2012 年马里廷巴克图世界遗产地苏非陵墓遭到蓄意破坏。不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和世界遗产委员会请求放过这些令人敬畏的坟墓的呼吁，极端主义者对它们进行不断地报复性破坏，直到 14 个陵墓被毁坏。从那时候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引领重建进

© Ammar Abd Rabbo / Abaca Press



程，并于 2015 年以创纪录的速度完工。当我们回答“是否应该重建”这个问题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值得一提的是，“突出普世价值声明”中所列的价值主要包括古坟墓是廷巴克图过去的见证，没有提及任何社区价值和建筑技术。只有在坟墓被毁坏后，它的社区价值及无形价值才被唤起。

重生方法

支持重建的观点主要存在于当地社区：传统建筑技术从先辈传承给新一代建筑者，重建工程使整个社区的人们团结在一起，而遗址也继续成为举行宗教仪式和冥想的地方。的确，本地社区参与重建墓地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种和解进程，是获得重生的方法。



叙利亚，饱受战争蹂躏的阿勒颇，人们将床单悬挂在街上，以阻挡枪林弹雨。

除了世界遗产委员会指导性文件所列的规则之外，反对重建的观点主要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策过程缺乏透明性，还担心决策撇开了当地社区，只由专业人士和政府组织来做。因此，全面记录决策过程至关重要。如此，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理解抉择的理由，考虑过何种选择方案，了解被保留下来和被新创造出来的价值。另外，为了有利于给

后人提供进一步的考虑空间，有必要在发生创伤后给予时间思考，比如廷巴克图事件。墓地重建可以随着时间抹去人们的记忆，剥夺人们思考过去的空间。坐落在日本的广岛和平纪念公园里那座半毁的原子弹爆炸圆顶屋正起到这个作用，提醒人们勿忘人类制造的最具破坏性的爆炸。

需要新的指导

关于重建这个议题，世界遗产委员会所做的临时决定似乎表明一些新举措。这一变化对诸如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这样的保护学说守护者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来自如此有声望的国际机构的决定为不同的保护标准提供了依据。考虑到不断变化的情况，制定新的指导方针是必要的。遗产保护宪章应该向新思想开放，保护方法也需要更新。

自从 19 世纪保护学说产生以来，每代人都添加了新的原则和指导意见。世界遗产操作指南中表明的以有形因素为基础的保护学说仍然是我们遗产的一部分。《巴拉宪章》是个转折点，开始转向以价值为基础的保护，关注遗产和文化的价值。《奈良宣言》强调文化的多样性和价值的相对特性，鼓励遗产保护者以这一新的视角去解读《威尼斯宪章》。这一新增方法是思考重建问题的一个好的出发点。

克里斯蒂娜·卡梅伦（加拿大）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和遗产建筑研究教席。她在加拿大公园担任遗产领域领导职务超过35年。她积极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工作，并在1990年—2008年期间担任加拿大代表团团长和世界遗产委员会主席。

早期识字能力， 熟练阅读的关键

海伦·阿巴兹

大规模难民流离失所严重破坏了成千上万儿童的早期识字能力。教育专家海伦·阿巴兹强烈主张给儿童打早期文盲“疫苗”，而且必须在儿童年满 18 岁之前。海伦·阿巴兹的工作为低年级阶段掌握阅读成为国际社会重要优先项目做出了贡献。

每年 9 月 8 日国际扫盲日我都会想起在我青年时期的那些文盲妇女。几十年前，我的祖国希腊饱受贫穷和种族冲突之苦，和今天一样，贫穷和冲突给教育带来同样的冲击。

20 世纪 30 年代，那时很少有乡下女孩上学。我两位在雅典居住的姨妈雇用了一个年轻的农家女孩。两个姨妈是教师，她们认真地教女孩用相对一致的希腊拼字法阅读。这个叫玛丽亚的女孩学会了字母，但是一直只认得单个的词，最后她放弃了学习。玛丽亚负责照看一些孩子，孩子们在她身边学习，但她自己直到 90 多岁去世时仍是文盲。

我的姑妈因为种族冲突和居无定所而无法上学。1922 年她和家人从土耳其逃到希腊，我的祖父母辞世了，姑妈从未上过学。当她 40 多岁的时候，她跟她的教师女儿学习基础阅读知识。她一生中一半时间在一个大城市度过，周围有很多文字招牌。她 97 岁的时候，我试了她一下，发现她只认识大写，并且还念得磕磕巴巴，最多也只是能认出一些公共汽车路线牌。

但是，看护我长大的索菲亚却达到了完全不同的水平。索菲亚 1922 年离开土耳其，在成为无家可归的孤儿之前上过小学一年级。当我开始学习阅读的时候，是她帮助我的。她用迟疑的语调念着我们的教科书，这让我们发笑，但是她能弄懂整句话的意思，并且她坚持不懈地练习，不断进步。在晚年，她戴着眼镜，翻开报纸，给我母亲念新闻。

这幅三维画放大了 11 岁女孩瓦拉的一幅图画，它唤起了瓦拉在祖国叙利亚的学校惨遭轰炸的记忆。布景由瓦拉在黎巴嫩贝卡平原一个难民营的小朋友完成。这些孩子在救助儿童会创办的学校上学，参与阅读等各类教育活动。





成人阅读障碍

多年以后，我在世界银行担任教育专家期间，分析和评估了多个成人扫盲项目。尽管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政府和非政府组织为成人扫盲付出了很大努力，但这些项目中提到的情况却让我想起童年时代的记忆。在孟加拉国，即使经过一年训练，学习者阅读起来仍然非常艰难。在布基纳法索完成扫盲培训的成人每念一个词都要停顿一下，甚至还要费力辨认自己写的字。与此相反，在童年时代短暂上过学的人读

起来就轻松自然，像索菲亚一样。二者差异惊人。

阅读吃力的不仅仅是没上过学的成人。受过教育的外国人在学习一门字母表与其母语不同的外语时也有同样的问题。“西方的”学者或援助人员在埃塞俄比亚或孟加拉国生活了几十年，可能会流利地讲当地语言，但是阅读却始终都像一个低年级小学生一样。对他们来说，阅读时面对的是一堆缠绕的字母，需要一个一个解开来。学习阅读因此变得枯燥无味，很多人就敬而远之了。

这些情况说明了一个突出现象，我们可以称之为“成人新识字的阅读障碍”。人到了 19 岁这种障碍尤显重大，几乎我们每个人都受之影响。18 岁之后才学习不同语言字符的大学生往往读得很慢，并且几十年中都会有阅读理解困难。多项认知神经科学研究表明，阅读困难在成人中持续存在。成人阅读障碍可能部分解释了全球成人扫盲项目效果差的原因。但是这个原因被忽视了，教育者们通常将原因归结于社会问题、学习人员的积极性问题和组织问题。这些原因当然很重要，但那些努力学习的人的情况也令人失望。这种奇怪的阅读障碍是无形的，因此很少有针对性研究。

但是什么是轻松阅读？它为什么很重要？这种能力看似是童年时期里自然成长的过程，但是它需要特定的大脑转换。

给孩子打文盲疫苗

阅读是一种感知学习功能，在最初的几毫秒，它和意义无关。经过练习，字母形状被分组，并同时在大脑进行处理。如果符号是用模式类比法一个个分开教的，大脑处理字母的工作效率最高。这种练习会把小单位组合成大单位。学习某些语言的字母和拼写系统需要更多的时间。但是不管哪种文化，从法国到中国，人们是用相同的大脑结构来阅读的。



© Patrick Willocq / Save the Children

一开始，学习者需要有意识地努力来解密字母。然后，经过几十个小时的训练，这种处理就会转移到大脑的另一部位，这个部位会像辨认面孔一样认识词汇。再接下来，一眼就能认出一串字母，犹如认出面部特征一样。这时阅读变得容易了，自动化了。我们无法停止阅读，就像我们不会认不出我们已经认识的人一样。此时阅读的速度达到了每分钟 45—60 个字。

通过感知学习，人类可以学习识别标记、音乐符号、数字、数学方程、星座或天气预报征兆。这种视觉功能一旦获得并定期练习，就会保留在记忆里。因此，我们可以给孩子打文盲“疫苗”。

有意思的是，流利阅读并不非要懂，也不需要能书写这门语言。由于宗教原因，全世界有几百万儿童学习阅读用他们不认识的文字书写的文本，这种文字的书写方式和他们的官方文字是不同的。如果字母和音素是一致的，如西班牙语或印地语，而不是英语或高棉语那样不一致的话，学习变得非常容易。但是要理解一篇文章，是需要流利性的。记忆的短暂性要求速度。一个受过教育的成人每分钟可阅读 250—350 个字。

辍学前就掌握了“自动化”的孩子或许能够认读他周边环境里的文字招牌，得以充分练习，因此能保持并提高阅读能力。我的幼年时期的看护人索菲

亚就是这种情况。但是没有掌握流利阅读就辍学的话，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解码太乏味了，如玛利亚和我姑妈，她们或许会看到一块商店标识和一个街道名称，却读不懂。

不幸的是，拥有这种自动阅读大量符号的能力是有截止期限的。一些感知神经回路有敏感期，并且在青春期逐渐减弱。如果自动阅读的过程被中断多年，孩子将失去学习阅读能力的宝贵时间，且无法挽回。

80 岁的帕拉池娃在烛光下阅读。她住在罗马尼亚布科维纳的一个偏僻小村庄。



© Radu Dumitrescu



流利性应该在18岁之前获得

21 世纪大规模的难民流离失所造成了严重的文盲危机。许多孩子在关键年龄段被迫中断学习。从叙利亚到希腊，再到德国，他们可能永远都无法掌握感知性要求较高的阿拉伯文字“自动化”阅读。对于部分孩子来说，中断是永久性的。流离失所并非儿童识字的唯一威胁。一些低收入国家扩大了他们的教育体系，但不知道该如何教育弱势群体，导致了一代“上学文盲”的产生，使用拼写复杂的英语或法语更是加剧了这种情况，以至于很多非洲学生最多只会辨认出少数几个英语或法语字母或词。有些人成年后参加扫盲班，但是世界银行指出，这对于培养必要的“自动化”能力而言可能太晚了。

这些有关神经学的现实情况对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有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 4.6 表明：到 2030 年，政府应确保所有青年和大部分成年男女具有识字和识数能力。为了方便学习，减轻教师工作量，我们应该让神经认知研究发挥作用。

激活感知学习功能并不需要复杂的教学活动。教师应该在课堂上用适当的方式讲解字母拼读和模式类比，提供反复练习，并给以反馈。实用的练习可以把小单位和大单位连接起来，把词和句子连接起来。

培养这种“脸部”识别技能需要又厚又丰富的书本。大脑的视觉还要求写得又大又有空隙。书写有助于阅读，而且必须掌握一定的词汇量来理解课文。阅读的过程大同小异，对于几乎所

有语言和文字来说，每分钟阅读 45—60 个字可以作为“自动化”的大概标准。为了让孩子理解并产生阅读乐趣，读完小学二年级后应该达到这个速度。

关于阅读，捐助国和政府收到的反馈建议常混乱费解。虽然传统的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学习方法更加符合大脑机能，但还是被反映中产阶级观点的现代综合方式取代了。但这可能给贫困人群带来严重后果。一直学习拼写语言的学生可以在一年级就具备足够的阅读能力，可以渡过以后的学习中断期。传统的识字课本就是这样设计的。但是采用“现代”方式则使进步变得缓慢，让学生在遇到生活挫折时无能为力，有可能成为功能性文盲。

国际扫盲日让我们认识到，必须保证从童年时期就学会阅读“自动化”，因为“自动化”功能有时间限制：最晚到 18 岁，任何孩子应该能够流利阅读一种或多种文字。将来，生物医学研究也许会缓解这种神经学现象，但是



© Merijn Hos (merijnhos.com)

虚构的大脑不同认知能力分区的画面
作者：荷兰视觉艺术家梅利津·奥斯

从现在到 2030 年，目标是明确的。战争和人口流离看起来是人类发展的固有现象，但教育界应该时刻做好准备。捐助国和政府应该让现有研究工作致力于孩子在一年级就获得阅读“自动化”能力的研究。这样，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孩子学业中断，将来他们长大成人，可以更像索菲亚一样，而不是像玛利亚那样。

海伦·阿巴兹 希腊心理学家，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研究员。她曾作为高级教育专家在世界银行工作 27 年，并运用感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改进教育投资效果。2015 年，海伦·阿巴兹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扫盲奖评委会的五位成员之一，2016 年—2017 年 6 月期间担任评委会主席。

开放式教育资源： 合法自由共享，促进更好学习

by David Kindler (CC BY 2.0)



凯布尔·格林，知识共享组织（CC）
的开放式教育部门主管

2017 年 9 月，凭借这篇文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公开教育资源大会占有一席。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丰富的时代，每个人都可以获取他所希望获得的知识，这是史无前例的。这场教育机会巨大变革的关键是开放式教育资源（OER），为所有学生提供可以合法下载、改编和共享的全部免费材料。

在过去 20 年里，我们通常用来教读写、物理和批判性思维的不同教育资源——教科书、录像、课程、学历课程等，都已“数字化生成”。尽管我们仍然使用印刷文本，不通过因特网获取学习资料，但这些材料都有一个电子存档。受益于网络、低成本磁盘空间和云计算，我们几乎可以零成本存储、共享、复制数字化教育资源。

但是怎样才能在不侵犯知识产权的情况下共享数字化学习内容？怎样合法共享？

凯布尔·格林

无法全面获取高质量教育资源仍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但凯布尔·格林告诉我们，好消息是开放式教育正在扩大资源获取面，降低费用，改善学生学习条件。

开放式教育资源的主要特征是它的开放版权许可，以及从法律上允许公众使用、修改、共享资源。没有明确指出属于公共领域或拥有版权开放许可的教育资源都不是开放式教育资源。

获取受版权保护的教育资源开放版权许可使其成为开放式教育资源，最普遍途径是对资源添加“知识共享许可”（CC）。这些许可都是标准化的、免费使用的开放版权许可。根据 2015 年知识共享许可报告，已经有 900 万个网站上的 12 亿多版权作品使用了知识共享许可。当作者将一部作品置于知识共享许可下时，他们保留自己的知识产权，但又根据自己选择的条件与公众免费共享。



充分开发开放式教育资源潜力

必须注意“开放”不等同于“免费”。所有开放式教育资源都可以免费获得，但不是所有的免费内容都是开放式教育资源。比如众多“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简称 MOOC）是免费的，但不是开放的。也许可以免费获得 MOOC 课程内容，但是只有其课程内容处于开放许可状态或者置于公共领域时，它才算是开放式教育资源。这一点在我们想把 MOOC 课程翻译成另外一门语言，和/或者对其做修改以适应当地情况来满足学生需求时就特别重要。

开放式教育资源可以自由保存（复制）、再使用（原样使用）、修改（改编、校正、改动）、再混合（将不同内容制作成一份新内容）、再传播（和第三方共享）而不违反版权法。当然，为了充分利用开放式教育资源，教育工作者和学生需要随时随地拥有电脑、移动设备和网络连接等通信技术基础设施。

总之，开放式教育资源得以利用的条件有：1）教育材料以数字化形式存在（大部分开放式资源都是数字化生成，尽管提供给学生时既可以是数字版的也可以是印刷版的），数字版几乎可以用零成本储存、复制和共享；2）互联网让人人轻松共享数字化内容；3）得益于“知识共享许可”，我们可以轻松合法地保留版权，又能合法地和全世界共享教育资源。

开放式教育资源大幅度提高了获取教育的机会。



© Patric Sandri

开放式教育资源有何不同之处？

如果高等教育机构选择开放式教育资源，教育将会发生一系列积极变化。首先是获取教育资源更加公平：所有学生从开课第一天起就可以获取促使他们学业成功的所有教育材料。这听起来好像是不言而喻的，但即使在美国，三分之二的大学生因为经济条件无法购买教科书。

第二个积极影响是所有学生可以获取合适的、符合背景的、特地为他们编写的学习内容。比如一个孟买的教授可以下载巴塞罗那大学分享的开放许可教科书，将它译成印地语，并加入自己的学生感兴趣的例子。

第三，学习成绩提高了或保持不变，但成本却降低到几乎为零。当一个班级所有学生从第一天起就能获得所有教育资源，他们就会成功。2015 年出版的一份对 16000 多名公立学校学生的分析报告表明，使用开放式教材的学生与使用传统教科书的学生相比，学习成绩一样好，甚至更好（莱恩·菲舍尔、约翰·希尔顿、贾里德·罗宾逊和大卫·威利，“采用开放式教科书对高等教育学生学习成绩影响的多学科研究”，《高等教育计算》，2015）。

第四，我们还发现课程完成率上升了。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潮水社区学院的数据表明，使用开放式教育资源的不同学科学生不管是课程完成率还是成绩提高多达百分之十一（莱恩·费舍尔、约翰·希尔顿、大卫·威利和琳达·威廉，“以高态势毕业：开放式教育资源与课程完成率”，《开放和共享式学习研究国际评论》，2016）。

当学生能获取所需要的全部教育资源时，他们就能成功完成学业。随着越来越多学生完成学业，获得学位所需的时间也缩短了。这样，得益于开放式教育资源，教育机构能帮助学生更快、更好地完成教育，使公共投资变得更加有效。

微芯片突触 29——在现在和无限之间。作者：意大利艺术家莱奥纳多·优廉

第五，一旦我们在学习空间拥有开放式教育资源，学生和教师就可以选择开放式教育实践，即“合作实践，包括开放式教育资源的创造、使用、再使用，和基于参与性技术、相互学习、知识创造、共享和自我激励的教学方法”（凯瑟琳·克罗宁，“开放与实践：探索高等教育中的开放式实践”，《开放和共享式学习研究国际评论》，2017）。克罗宁表示，学生们成了知识的共同作者、产出者、创造者，他们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对开放式教育资源进行创造、更新和改善。



© Leonardo Uljan (www.leonardouljan.com)



需要政策支持

政府支持开放式教育的一个方法是制定一项简单的政策：要求公费教育资源实行开放许可。

开放教育许可政策只需在现有支持教育资源的资金系统（如赠款、合同和其他）中加入开放许可要求：由此将内容转换成开放式教育资源，并把公费教育材料默认模式由“封闭”转为“开放”。这一点在教育政策领域尤其适合——只要是政府资金资助的教育资源，公众应该完全有权自由使用，无需支付额外费用，并有权修改开放教育资源内容以满足不同地区需求。

这一切看似不言自明，但情况并非如此。不幸的是，公费教育资源几乎都被商业化，只有愿意再次付费的人们才能获得。为什么一国公民需要为已经支付费用的教育资源再次付费呢？

政府、基金会和教育机构能够也应该执行开放许可政策，要求受其资助的教育资源列入开放许可。应该有强有力的政策将此列为强制性的，并对开放许可进行明确定义，理想做法是执行知识共享署名许可（CC-BY），只要标明版权属于作者即有权完全再使用。

可喜的是，这些政策开始被采纳。2012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总部召开了世界开放教育资源大会，发表了《2012年开放式教育资源巴黎宣言》。该宣言呼吁各国政府“鼓励公费教育资源实行开放许可”。看到众多国家采纳了这项建议，我无比高兴。

总而言之，如果我们想普及开放式教育资源；如果想给各年级、各课程、各语言策划整套开放式教育资源，并根据当地需求定制；如果我们要为编写、采用、定期更新开放式教育资源获得大量资金，那么我们需要：1）普及开放

式教育资源知名度，并给予系统支持；2）更大范围推广开放教育许可政策。当所有的教育者都热衷于获取免费、开放的教育资源，当我们改变了资助规则，当所有公费教育材料都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那么，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人人都可以获得他所希望获得的教育。

凯布尔·格林（美国）知识共享组织（CC）的开放式教育部门主管。知识共享组织汇集了500多名研究员、活动家和法律、教育、科学、博物馆和政策方面的活动家和志愿者，组成遍及85个国家的全球性网络。





给青年发言权!

新闻

为了迎接 8 月 12 日的国际青年节,《信使》专门留出以下页面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项目,这些项目是专门为希望参加志愿者行动和对话的年轻一代而设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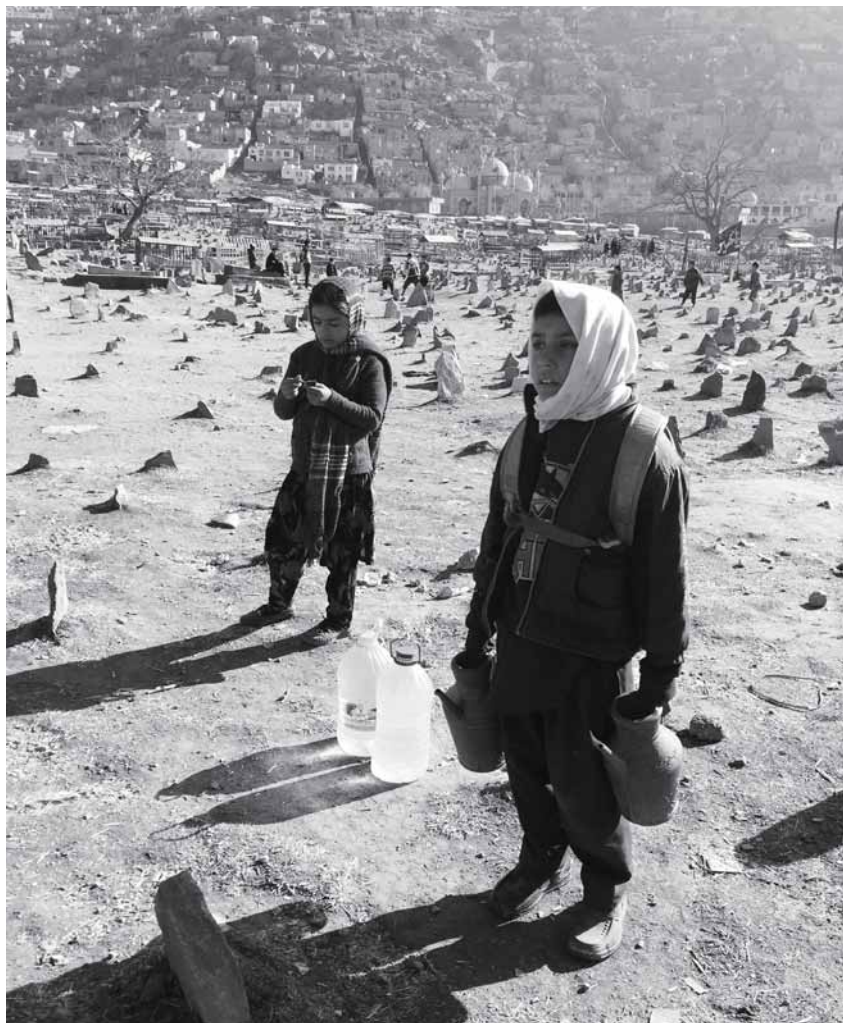
“如果我是……”

这是一张奇怪的照片,有一个同样奇怪的标题“这些让我们活着的坟墓”。27 岁的维萨尔·苏莱曼拍摄了这张照片,他目前生活在德国。他说:“它让我同时充满了悲伤和喜悦。”这张照片是为了纪念他在喀布尔旅游期间看到孩子们为了钱被迫去清理坟墓的情形。在严冬中,孩子们的手都冻僵了,而他们却要爬上清真寺后面的山头去运水!当苏莱曼问他们是否喜欢这份工作时,孩子们回答:“喜欢,它让我们可以上学。”

“我努力想象如果我是他们会怎么样,”维萨尔解释说。他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如果我是……”竞赛的 10 名决赛选手之一。这个竞赛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在 2017 年 2 月 24 日至 3 月 12 日期间,选手们可以用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参赛。在这两周的时间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到了来自全球 117 个国家的 837 份参赛稿。

参赛者年龄在 21 岁到 30 岁之间,他们通过照相机或录像机的镜头来想象自己身处他人的境遇中。

10 名决赛选手都赢得了一个 iPad mini,并获邀在“第二届国际青年志愿者行动和对话大会:预防暴力极端主义,加强社会包容”上介绍他们的照片或录像。该大会于 2017 年 9 月 25 日



© UNESCO / Vesal Sulaiman

至 27 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巴黎举行。

在三天的会议期间,来自全世界的 100 多位年轻参会者有机会分享他们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不同领域的授权志愿者所获得的经验和知识。他们还应邀提出各种旨在促进团结、共情、批判性思维、社会承诺和公民参与的合作项目。

研讨会和全体大会的四个主题是:难民与移民、跨文化教育、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在构建积极对话中的作用、青年参与文化遗产。

联系方式: youth-conference @
unesco.org

世界遗产志愿者行动

世界遗产志愿者行动于 2008 年发起,为年轻人提供了投身世界遗产保护的机会。志愿者们通过学习相关技能,融入当地的社区生活来开展保护工作。

在世界遗产志愿者行动 10 周年之际,51 个青年行动项目将于 2017 年 5 月至 11 月期间在 32 个国家展开实施。今年,尼泊尔加德满都谷地的金刚山神庙建筑群、墨西哥波波卡特佩特火山斜坡上 16 世纪的修道院、德国魏玛公园和园林、乌干达鲁文佐里山国家公园的高耸山峰以及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都欢迎年轻人投身人类共同遗产的保护工作。

这项活动是 1994 年启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教育计划的一部分。它试图鼓励 and 培训未来的决策者加入到遗产保护中，对世界遗产面临的持续威胁做出回应。

联系方式：Ines Yousfi (i. yousfi @ unesco.org)

生物圈保护区青年论坛

在日本绫町生物圈保护区，孩子们划船了解自然和环境。

年轻人，特别是在生物圈保护区生活或工作的年轻人，是这些地区（包括陆地、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的未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年轻人应该在领土塑造中拥有自己的发言权，并由他们自己来定义他们在人与生物圈计划（MAB）中的角色。

这促使了 MAB 秘书处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威尼斯地区办事处举办 2017 年 MAB 青年论坛。论坛时间为 9 月 18 日至 23 日，地点在意大利波河三角洲生物圈保护区。2016 年 3 月，在秘鲁利马第四届生物圈保护大会上，举办

该活动的消息一经宣布，就获得了全场的起立鼓掌。

论坛针对 18 岁到 35 岁的青年，旨在培养他们成为变革的推动者，促进社会更加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一个重要目标是：通过互相交流最佳实践，推动建立将生物圈保护区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工具，从而实现从自然资源的良好管理到绿色经济，从可持续旅游到教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该论坛也契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青年行动战略（2014 — 2021）的精神——青年是发展与和平的主要伙伴和行动者。

通过让青年利益相关方参加一个大型的在线咨询活动，获取论坛期间将要讨论的问题。咨询活动中出现了三个主要主题领域：年轻人对生物圈保护区的贡献、生物圈保护区可持续发展研究、青年的可持续未来——给青年发言权表达他们的关注点，鼓励青年交流最佳实践和商业理念并递交给潜在的资助者。

联系方式：Philippe Pypaert (p. pypaert @ unesco.org)

发展青年之间的对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有 195 个成员国，它通过鼓励创新、培养创造力、鼓励反思，特别是对文化冲突和宗教冲突等热点话题的反思，来为年轻人创造环境，帮助年轻人自我绽放，成为有责任的公民。

为了把这些理想变成现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办事处组织了首届文化和宗教间对话青年大会。大会在 2017 年 9 月 21 日举行，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年轻研究人员和活动家齐聚一堂，寻找帮助解决该地区文化和宗教冲突的方案。

大会有一系列活动计划，包括跨文化对话研讨会，地区内不同文化介绍，不同经历分享等。参会者还将学习理解其他文化的态度和反应，思考克服跨文化问题的方法。

这一活动旨在促进宗教、心灵和人文传统之间的对话，理解他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以消除偏见、建立互相尊重的关系。

联系方式：Arina Plokhikh (a. plokhikh @ unesco.org)



日本绫町生物圈保护区，孩子们一边划船一边学习自然与环境的知识。

© Aya Biosphere Reserve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 新起点

“仅仅从这本标志性刊物的名字上，就能体会到我们的本质。从1948年2月创刊以来，到我现在手中的这本，《信使》一直忠于自己的使命：宣扬人道主义理念，搭建文化间对话平台，提供国际讨论的安全平台。”



© UNESCO

4月27日，在巴黎《信使》复刊仪式上，年轻人高喊“信使万岁”！

2017年5月13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的复刊如是说。

因经费原因停刊了五年的《信使》期刊，由于中国政府的慷慨支持，于2017年4月重获新生。限量纸质版季

刊、《信使》网络版重新上线，共有七种语言版本：英文、阿拉伯文、中文、西班牙文、法文、葡萄牙文和俄文。网络版免费阅读：zh.unesco.org/courier。您只需轻轻点击，就可以翻阅以往期刊。

我们正在拓展网络版本内容，并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以增加新的语言版本。

2017年4月27日，伊琳娜·博科娃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信使》复刊仪式上说：“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各国全国委员会的协助，本期刊拥有35种以上的语言版本。”随后，她又说她确信和中国的合作伙伴关系将鼓励“众多的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在《信使》的全球推广中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

5月1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复刊仪式在北京举行，出席人员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女士，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黄坤明，教育部副部长、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主任田学军，中国出版集团总裁谭跃，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杜越。



展览

反对“普通”种族主义

遗传学是如何讲述人种多样性的？仇外从何而来？如何理解种族主义行为和言论？哪一种模式最适合我们尊重平等权利，彼此和平相处？这些是巴黎人类博物馆“我们和他人”展览提出的问题。该展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于2017年3月31日到2018年1月8日进行展出。

本次展览基于人类学、生物学、社会学和历史的研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解构种族主义的理念相同。解构种族主义理念指导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项首要任务：通过科学和新闻，与偏见和成见——对人的类别、身份的固化、相异性这些处于“我们”和“他人”之间的象征性边界的偏见和成见——做斗争。

为此，本次展览向参观者提供了一条互动路径，引导参观者对导致排斥他人的个人和集体机制进行思考。展览还重点介绍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包容性和可持续城市联盟——这是一个旨在促进人在社会中和平共处的平台。



Illustration : Noma Bar

© Atelier Confino



分类圆柱使参观者明白对“他人”进行分类将导致成见和偏见，最终导致“现实中的”种族歧视。



联合国教育、
科学及文化组织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

www.unesco.org/publishing
publishing.promotion@unesco.org



全球海洋科学报告 全球海洋科学现状

ISBN 978-92-3-100226-7
378页, 21.5 cm x 28 cm, 平装本, 45 欧元

海洋是地球上最大的生态系统, 调节气候系统的变化、支持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人类生活所需营养、影响人们的健康和幸福, 并且提供水能源和其他能源。

全球海洋科学报告 (GOSR) 首次评估了世界各地海洋科学能力的现状和趋势。这份报告记录了全球开展海洋科学的执行者、方式以及地方——以此为基础形成相关领域知识体系、帮助保护海洋健康、让整个社会在联合国2030年议程的框架下支持可持续海洋管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艺术世界

ISBN 978-92-3-000027-1
432页, 26 cm x 33.5 cm, 精装本, 54 欧元

这本书汇集了一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藏的最美丽的作品。跨越六千多年的历史, 这个系列作品折射了世界创造力的多样性。在书中, 你既可以发现一些无名艺术家, 也可以看到全球最著名的一些艺术家: 胡安米罗、让·阿尔普、卡雷尔·阿佩尔、阿福罗·巴塞尔德拉、罗伯特·马塔、亚历山大·考尔德、爱德华多奇里达、亨利·摩尔、鲁菲诺·塔马约、安东尼·塔皮埃斯、野口勇、赫苏斯·拉斐尔·索托、勒·柯布西耶、卡洛斯·克鲁兹-迭斯、埃罗·安藤忠雄和其他艺术家。多年来, 多亏了各个成员国的大力支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目前收藏了800多件艺术品。它们是联合国最重要的艺术遗产。



世界遗产 第83期 博物馆和游客中心

ISSN 1020-4202 - EAN 3059630101837
88页, 22 cm x 28 cm, 平装本, 7.50 欧元

随着全球旅游业的逐年增长, 博物馆和游客中心对于帮助游客理解世界遗产地的文化和历史意义越来越重要。这其中也包括动物园和水族馆, 他们在物种保护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本期《世界遗产》展示了这些游客中心的作用及他们对游客体验的影响, 内容涵盖柬埔寨、老挝、越南等世界遗产地博物馆的恢复, 墨西哥国立故宫博物馆及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文化历史中的重要性, 维也纳动物园的保护、教育和研究工作, 建于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的印刷厂帕拉丁-莫瑞图斯工场 - 博物馆建筑群等。



订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

订阅《信使》中文版请与以下地址联系
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6层
中译出版社有限公司
电话: (010) 68359101 邮编: 100044

ISSN 2096-4064
CN 10-1517/C
定价: 36.00元